**上海市哲学社科一般项目研究报告**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与优化策略研究**

**报告日期：2025年5月**

**摘 要**

数字经济发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而如何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值得关注。我国政府致力于通过缓解企业税负压力、优化税制结构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然而，涉及到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及税收征管等税收治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成为制约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一大痛点。据此，如何厘清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生关系、科学评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构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新策略，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议题。

本课题先从理论上阐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再梳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特征表现，具体从税收治理制度、税收治理方式及税收优惠政策三个方面剖析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最后选取2011—2022年数字经济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立于政府设计的税收治理制度与征税机关履行的税收治理方式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

研究发现：（1）税收治理制度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演示为：第一，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能够缓解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第二，提高直接税占比通过缓解税收负担引致的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税收负担带来的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来间接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第三，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高速成长和市场竞争较强的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第四，随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的提高，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不再显著。（2）税收治理方式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演示为：第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第二，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两类代理成本来间接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第三，相对于国有和大规模数字经济企业，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和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本课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税收治理制度，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二是优化税收治理方式，改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环境；三是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政策精准度。

**关键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税收治理 税负水平 税制结构 税收征管数字化**

**目 录**

[**摘 要** 1](#_Toc196211671)

[**第一章 导论** 1](#_Toc196211673)

[**1.1 研究背景及价值** 1](#_Toc196211674)

[**1.1.1 研究背景** 1](#_Toc196211675)

[**1.1.2 研究价值** 2](#_Toc196211676)

[**1.2 文献综述** 3](#_Toc196211677)

[**1.2.1 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的相关研究** 3](#_Toc196211678)

[**1.2.2 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相关研究** 7](#_Toc196211679)

[**1.2.3 文献述评** 9](#_Toc196211680)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10](#_Toc196211681)

[**1.3.1 研究内容框架** 10](#_Toc196211682)

[**1.3.2 研究方法** 13](#_Toc196211683)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14](#_Toc196211684)

[**1.4.1 研究创新点** 14](#_Toc196211685)

[**1.4.2 研究不足** 14](#_Toc196211686)

[**第二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 15](#_Toc196211687)

[**2.1 核心概念界定** 15](#_Toc196211688)

[**2.1.1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15](#_Toc196211689)

[**2.1.2 税收治理** 15](#_Toc196211690)

[**2.2 研究理论基础** 16](#_Toc196211691)

[**2.3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 19](#_Toc196211692)

[**2.3.1 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19](#_Toc196211693)

[**2.3.2 分维度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20](#_Toc196211694)

[**第三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特征事实表现** 25](#_Toc196211695)

[**3.1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特征表现** 25](#_Toc196211696)

[**3.2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特征表现** 29](#_Toc196211697)

[**3.2.1 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收入状况** 29](#_Toc196211698)

[**3.2.2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安排** 32](#_Toc196211699)

[**3.2.3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 36](#_Toc196211700)

[**第四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制度视角** 40](#_Toc196211701)

[**4.1 研究设计** 40](#_Toc196211702)

[**4.1.1 模型构建** 40](#_Toc196211703)

[**4.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40](#_Toc196211704)

[**4.1.3 变量定义** 41](#_Toc196211705)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42](#_Toc196211706)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2](#_Toc196211707)

[**4.2.2 相关性分析** 43](#_Toc196211708)

[**4.2.3 多重共线性检验** 44](#_Toc196211717)

[**4.2.4 基准回归结果** 44](#_Toc196211737)

[**4.2.5 稳健性检验** 46](#_Toc196211738)

[**4.3 进一步分析** 48](#_Toc196211739)

[**4.3.1 机制分析** 48](#_Toc196211740)

[**4.3.2 异质性分析** 49](#_Toc196211741)

[**4.3.3 门槛效应分析** 51](#_Toc196211742)

[**第五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方式视角** 53](#_Toc196211743)

[**5.1 研究设计** 53](#_Toc196211744)

[**5.1.1 模型构建** 53](#_Toc196211745)

[**5.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53](#_Toc196211746)

[**5.1.3 变量定义** 54](#_Toc196211747)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54](#_Toc196211748)

[**5.2.1 描述性统计** 54](#_Toc196211749)

[**5.2.2 相关性分析** 55](#_Toc196211750)

[**5.2.3 多重共线性分析** 55](#_Toc196211751)

[**5.2.4 基准回归结果** 56](#_Toc196211752)

[**5.2.5 平行趋势检验** 57](#_Toc196211753)

[**5.2.6 稳健性检验** 57](#_Toc196211754)

[**5.3 进一步讨论** 60](#_Toc196211755)

[**5.3.1 机制分析** 60](#_Toc196211756)

[**5.3.2 异质性分析** 63](#_Toc196211757)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6](#_Toc196211758)

[**6.1 研究结论** 66](#_Toc196211759)

[**6.2 政策建议** 67](#_Toc196211760)

[**6.2.1 完善税收治理制度，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 67](#_Toc196211761)

[**6.2.2 优化税收治理方式，改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环境** 68](#_Toc196211762)

[**6.2.3 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政策精准度** 69](#_Toc196211763)

[**参考文献** 70](#_Toc196211764)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价值**

**1.1.1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体系。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业态，与新质生产力存在高度契合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而数字经济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是经济生态中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不仅引领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而且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近年来，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优势日益显著。一方面，从全球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表现突出。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报告（2024）》，我国在核心产业方面的发明专利有效数量于2018年超越美国，此后稳居世界首位。截至2023年，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专利有效量达到160.2万件，其中企业拥有116.7万件，占总量的72.8%。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2023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数字经济企业的TOP500榜单企业研发费用达到13633亿元，约占我国同年研发费用的40%；同时，TOP500榜单企业创新成果显著，共拥有发明专利77.3万件，约占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的18.4%。然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在核心技术及核心领域方面仍面临若干“瓶颈”问题，数字技术创新关键环节尚不具备显著优势。鉴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畅通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机制，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是亟须研究的重要现实议题。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治理体系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出一大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也给税收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税制要素边界模糊、税收管辖权受到冲击、税源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严重制约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为推动税收治理的适应性改革，国际社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中，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了应对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并于2023年正式落地实施。此政策为缓解跨境企业所得税分配不均、税基被侵蚀及利润转移等难题开辟了新的解决路径，标志着全球税收治理迈入了崭新阶段。

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税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通过创新税收治理体系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税收治理是涵盖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可演示为多元治理主体通过紧密协作，共同作用于税收治理客体，以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具体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领域，政府作为税收制度设计者，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调整税负水平发挥基础性作用；税务机关作为执行主体，则通过征管方式变革提升治理效能，二者共同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以及叠加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税负水平下降，能够有效缓解数字经济企业现金压力、增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投入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调节不同税种的构成比例逐步实现税制结构的优化，进而影响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传导效率。与此同时，税收治理方式的变革正重塑税收治理模式，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税收征纳效率，而且有效降低了数字经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营造更优的税收征管环境。基于此，本课题将探究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并立于不同维度税收治理来科学评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由此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新策略。

**1.1.2 研究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导致价值创造模式变革，我国现有的税收治理与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不兼容性日益显著，不利于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发展。基于此，如何改进税收治理制度，优化税收治理方式，构建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相适配的税收治理新体系，从而推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议题｡

**（1）理论价值**

税收治理是包含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既有文献多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和税收遵从的单一角度出发，探究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将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整合于同一研究范畴，综合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以至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理论分析呈割裂状态。此外，目前有关税收治理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企业，尚缺针对数字经济这一特定行业的影响研究。本课题从熊彼特创新理论、最优税制、协同治理等理论出发，构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税收治理以及税收治理的分维度系统分析其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可为提炼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提供理论标准与分析工具。

**（2）应用价值**

第一，立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及税收治理现状，梳理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安排及面临的挑战，可为政府发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及调整方向而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实证视角下，一方面基于政府税收治理制度安排的角度，探究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可为政府科学评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基于税务机关税收治理方式变革的角度，评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可为当前的税收征管政策调整以及正在进行的金税四期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提供佐证依据｡

第三，基于现状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提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优化策略，可为政府构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现代税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提供政策研究储备及决策咨询。

**1.2 文献综述**

**1.2.1** **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的相关研究**

**（1）税收治理内涵界定**

2013年，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及拉丁语的语境之中，蕴含“控制和操纵”之意。而国际社会采用“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治理危机”一词在总结非洲情况报告中首次被提及。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和组织对“治理”进行定义。詹姆斯·罗西瑙将治理阐述为一系列不依赖任何外在强制力，而建立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行动总和。此类行动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经济和社会的调节，并承担各自的职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阐释为公私部门在处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方式，包括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其中，正式的制度和规则是为了确保人们遵守执行，而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则是基于人们自愿或符合各自利益形成的，从而实现冲突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调和。综上可知，治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制度或安排，而且包括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利用自身的权威外，还可以利用其他管理方法和技术。

具体到税收领域，“治理”理念在远古时期也有所体现，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四原则”就含有税收治理之意，但在当时并没有被明确定义。近年来，随着治理理念的不断发展，税收治理的含义也逐步深化。刘燕明（2015）认为税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对税收权力的分配和运用，在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税收治理目标的一种活动[1]。相较于税收管理，税收治理更注重税务机关、纳税主体以及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参与，并坚持征纳双方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旨在促进税收活动的良性互动，其本质是税收管理的强化与拓展。向景（2017）指出，税收治理不再局限于纳税机关对纳税人单方面的管理，而更重视征纳双方的合作，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纳税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良好互动，这是税收民主的具体表现[2]，社会各方应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阚道远等，2020）[3]。杨世鉴（2023）认为税收治理是对税收管理的优化，它从一个更为宽泛的“治理”维度出发，审视税收管理中面临的挑战，并通过升级税收管理方式纠正税收管理中的配置不当问题，从而提升税收管理效能[4]。

**（2）数字经济内涵界定**

1996年，美国学者Don Tapscott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信息公路的普及标志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并详细分析了这种经济模式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继Don Tapscott之后，各国学者和组织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分析和定义。1997年，日本政府提出在数字经济模式下，信息技术会迅速发展为经济的支柱，而电子工具可能会代替原有经济中的人员、货物和货币的物理流动完成合同的签订、资产积累以及价值转移等。Kim（2002）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经济形式[5]。英国政府基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数字经济的新见解，他们把数字经济看成数字化要素的投入收益，其中数字化要素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等。Bukht et al.（2017）则将技术融合程度和内部运作模式引入数字经济的定义[6]。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会娟（2020）提出数字经济是一切具备数字化特征的应用活动的集合，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起支撑作用[7]。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表现出快捷性、外部性等固有特征，在促进商品流动、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张雪玲等，2017）**错误!未找到引用源。**。2024年，中国信息通信院在其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可以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程度的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迈进。

**（3）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的关系研究**

税收是政府常用的经济调控工具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陈邱惠等，2023；Davis et al.，2018）[9,10]。杨广莉等（2020）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率具有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11]。于井远（2022）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探究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优化税制结构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而且能够提升经济增长质量[12]。基于内生性增长理论，张胜民（2013）研究发现税收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地区差异性，增加所得税份额会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而增加财产税份额却能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13]。李齐云等（2017）基于税收分权的角度，研究发现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提高我国税收分权度不利于经济增长[14]。鹿刚等（2023）利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研究发现税收与税源分离不仅会抑制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而且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发展差距[15]。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与升级，基于工业经济的现有税收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治理体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的议题大多采用理论、问题和对策的研究范畴。**理论分析上**，Agrawal et al.（2021）通过对互联网渗透率的异质性分析，考察了互联网避税对税收的影响[16]。Francis et al.（2021）基于对税收和利润分配的理论分析，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税收归属的影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杨庆（2020）从政治经济学和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税收治理转型[17]；杨世鉴（2023）基于税收管理与税收治理对比的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给我国税收治理带来的挑战，从而为税收管理向税收治理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19]。徐绮爽等（2023）基于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的传导机制，研究了数字经济以及不同数字经济要素对横向税收分配的影响[20]。黄丽君（2024）从嵌入纳税人自然系统的角度，探究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治理面临的挑战[21]。金鹏（2024）通过构建多主体仿真模型，研究了平台数据对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并考察了征管信号的间接作用[22]。杜剑等（2024）构建了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三化”理论模型，梳理了数据价值化进程，并深刻剖析了涉税问题[23]。孙正等（2024）基于“价值理性—工具技术—组织结构—融合嵌入”的逻辑链条，构建了我国未来产业税收治理的逻辑框架，并厘清了税收治理的实践路径[24]。

**问题聚焦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税收治理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税制要素、税收管辖、税收收入分配和税收征管方式等方面。其一，就税制要素而言，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导致税收主体难以认定（胡若凡等，2021）[25]；数字经济的交易隐蔽性、业务模糊性导致课税对象难以界定；数字经济的虚拟性和跨区域流动性致使纳税地点难以评估。其二，在税收管辖方面，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给税收管辖权的来源地规则和目的地原则带来了巨大冲击（王雍君，2020）[26]。其三，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自动化数字服务等商业模式加剧了税收收入向发达地区的聚集（袁从帅等，2021）[27]，从而拉大地区间的税收收入分配差距（曹静韬 等，2022）[28]。田彬彬等（2024）提出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效能较为有限，难以应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收入与财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挑战[29]。其四，在税收征管上，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为税收征管的优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王丽娜，2021）[30]；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涉税要素复杂化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挑战（秦思楠，2022）[31]。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制度层面上，新兴经济形态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界定的模糊性使得传统以企业纳税人为主体的税收征管体系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二是技术层面上，数字经济的新特征对税务机关岗位职能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征管方式以及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均面临着严峻挑战；三是改革层面上，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水平亟待提升，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对策建议上**，学者们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治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应对税制要素问题上，王雍君等（2022）建议将纳税地点与财政体制的兼容性挑战视为税收治理的核心议题[32]。马洪范（2021）建议构建数字经济税基评价体系，规范数字经济活动的税制要素[33]。王宏伟（2023）提出基于税制优化的基本原则，进一步修改完善个别税种的税收制度[34]。刘奇超（2019）提议通过借鉴国际数字化税改中的相关准则，建立数字经济税收政策体系框架[35]。在应对税收管辖挑战方面，李慧敏（2022）建议借助构建国际税收的数字身份、数字存在及数据价值的新联结因素来缓解税收管辖权争议引致的国家间税收利益失衡[36]。具体到增值税上，樊勇等（2021）提出区分跨境增值税管辖判定准则，优化增值税征收管理模式以及加强国际征管合作等措施[37]。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学者们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提出应对之策。纵向上，崔琳等（2023）认为可以适度调整央地分成比例，提高转移支付的区域精准性[38]。横向上，以所得税为例，李建军等（2023）提出应改变现有的基于生产地或所在地的横向税收分配机制，同时引入包含资产、劳动以及销售收入三因素的分配比例法，来重新调整企业所得税在地方间的分配比例[39]。在税收征管方面，李鑫钊（2023）提议建立涉税共享机制，加强跨境税收监管[40]。Kleven（2018）建议进一步加强征税机关信息化建设[41]。秦思楠（2022）建议推进税企直连机制，增加数字化平台税收代扣代缴机构[42]。田发等（2023）在研究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流失的基础上，提出优化税制要素设置和试点具体税种改革等策略[43]。袁娇等（2024）建议进行数字经济税制适配性改革，并围绕适配要求、适配原则、适配思路和适配重点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策略[44]。蒋轶彪等（2024）基于数字经济税收治理调研结果，从兼顾公平与效率、完善促进平台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提高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水平和协同治税水平等四个层面提出针对平台经济税收治理的对策[45]。

**1.2.2 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相关研究**

税收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涵盖税收治理主体、税收治理方式、税收治理客体等多个方面。当前有关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文献呈分割状态，学者大多从税收治理的单一角度研究税收治理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经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创新与税负水平**

目前有关企业创新与税负水平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但主流观点认为税负水平过高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邓力平等（2020）以2012—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企业税负的降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加，且其影响效果具有产权异质性[46]。具体到个别税种，肖鹏等（2023）指出所得税和流转税税收优惠均能促进企业创新[47]。机制研究上，有学者提出融资约束是税负水平作用于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Guceri，2018；刘诗源等，2020）[48,49]。胡华夏等（2017）则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够通过企业成本粘性间接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50]。与此同期，林志帆等（2017）采用世界银行2012年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了投资回报率、利润率和企业经营风险的间接作用机制[51]。此外，李苏敏等（2020）则从宏观视角出发，采用PVAR模型研究宏观税负的变化对区域内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宏观税负的下降能够提高区域内企业研发创新效率[52]。孙红燕等（2024）在探究地方政府专项债对创新的关系时发现，地方政府专项债扩张可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越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创新促进作用越显著[53]。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或者具有促进作用。孔军等（2021）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引致的税收负担下降只增加了企业的策略性创新产出[54]，若税收优惠政策设定不合理，将会导致企业为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而虚增创新产出数量，反而不利于创新质量的提升（杨国超等，2017）[55]。周宇等（2022）采用2010—2019年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企业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应用效率的正向效应均受制于一种U型条件，税负水平与技术开发效率的负向关系并不显著，且适度的税收负担有利于技术开发效率的提升[56]。郝秀琴等（2023）以盈余管理为中介变量，研究发现税负水平提高可以通过节税盈余管理间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而调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税负带来的研发投入增加行为[57]。

**（2）企业创新与税制结构**

税制结构体现了不同税种在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布及其构成比重。目前众多学者对我国税制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我国间接税占比过高，在促进创新发展方面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从国内外文献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税制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二是从宏观层面探究税制结构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微观层面上，汪卢俊等（2019）基于2008—2016年制造业行业数据，采用两步回归法分析税制改革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直接税占比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改革举措对推动制造业技术升级具有积极作用[58]。林志帆等（2017）选取城市层面的增值税和企业层面的所得税作为研究指标，结果发现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59]。之所以会产生以上差异，主要在于流转税在减缓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增加企业资金成本方面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所得税对资金周转速度和资金成本的影响较为有限（吴强等，2021）[60]。宏观层面上，肖叶（2019）以286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税制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与直接税均会对创新产出产生负面影响，且间接税的负面影响相对直接税较大[61]。何培育等（2022）采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当前税制结构不利于专利产出数量的增加，直接税和间接税均对专利产出具有负面影响[62]。

**（3）企业创新与税收征管**

有关企业创新与税收征管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两点：大部分学者认为强化税收征管能够激励企业创新；少数学者则认为强化税收征管会抑制企业创新。就激励效应而言，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Karthik et al.（2019）指出税收征管所发挥的“治理效应”，能有效改善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63]。田发和邹思远（2024）以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税收信息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情况[64]。兰虹竹等（2021）基于“竞争效应”和“资源效应”的视角做了进一步探究，结果发现税收征管对不同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税收征管对产业竞争程度高、自由现金流高、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的创新提升效应更为显著[65]。唐玮等（2022）利用DEA模型测算了2015—2018年A股医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并实证分析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机制研究表明税收征管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间接影响企业创新[66]。何凌云等（2020）研究发现税收征管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进一步证明了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67]。白世杰（2023）基于柔性税收征管的视角，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更有助于企业创新，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68]。谢乔昕（2024）以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改革为背景，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有利于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增强，并指出避税行为、代理成本和可支配现金流是税收征管数字化作用于企业创新注意力的主要途径[69]。在抑制效应方面，谢获宝等（2020）利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征管、营改增与企业创新三者的关系，结果发现加大税收征管强度会削弱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70]。

**（4）企业创新与税收遵从**

通常来说，较低的纳税遵从不仅会减少企业的财政收入，而且不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现有文献较少关注税收遵从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税收遵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避税对研发创新的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在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孙雪娇（2019）认为纳税遵从度高的企业通常能获取更多的信贷融资，从而降低信贷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71]。李林木等（2020）基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结果，考察了赏罚机制对纳税遵从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赏罚机制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绩效，且对于纳税遵从度较高企业的绩效提升效果更明显[72]。另一方面，在企业避税与企业创新上，王钰琪（2023）研究发现企业避税对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影响，合理的避税活动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73]。李文贵等（2019）基于“资源观”和“代理观”两种相反的角度，研究发现企业避税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数量，且避税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源于资源观[74]。张欣等（2022）则基于价值观和代理观的视角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企业避税对创新具有非线性影响，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加，企业创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75]。

**1.2.3 文献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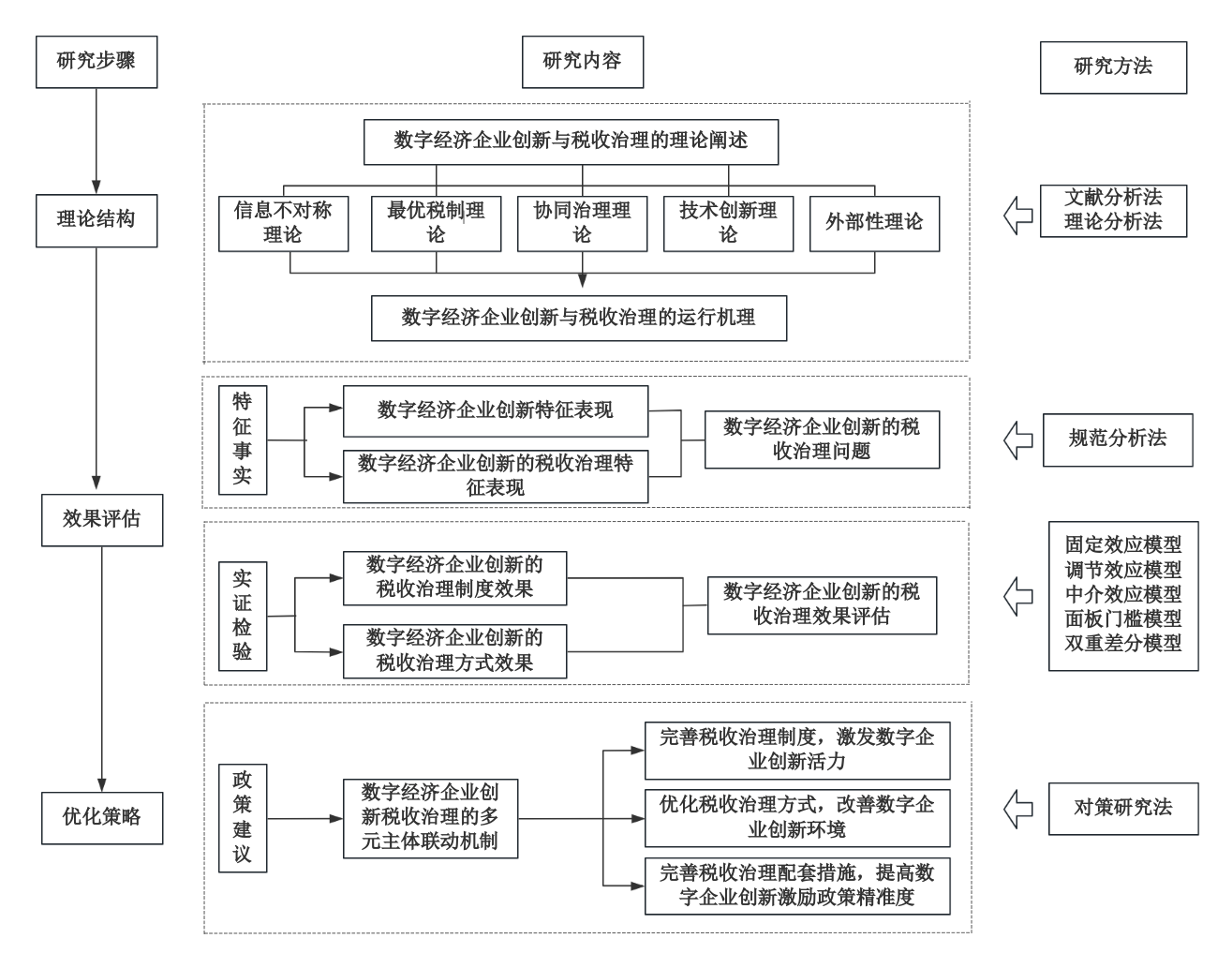
已有文献从税负水平，税收优惠、税制结构、税收征管等多个方面论证了税收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税收政策的复杂性、企业创新活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税收环境的差异性，学者关于税收治理的各个方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并未形成统一共识，需要进一步经验支撑。**第二**，税收治理是涵盖政府、税务机关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不同主体在税收治理过程中承担不同职责。现有文献多从政府、税务机关和企业等单一视角出发，探究税收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忽视了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缺乏对多元主体政策协同的深入研究，难以为税收政策协同增效提供可靠的理论借鉴。**第三**，目前关于税收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规范性分析层面，而税收治理与企业创新的量化分析较少，以至于没有明确指出当下税改的症结与方向。**第四**，目前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企业上，而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行业在研发创新方面具有较强特殊性，尚缺针对数字经济这一特定行业税收治理与企业创新的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课题以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税收治理多元主体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从税收治理主体、税收治理方式和税收治理客体等方面构建税收治理的完整链条。与现有文献相比，本课题的**边际贡献在于**：**（1）**突破了就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等单一视角分析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研究限阀，为形成多元税收治理主体的联动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2）**课题阐述了作为多元税收治理主体的政府和征税机关如何通过税收制度安排和税收治理方式变革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弥补了相关理论的不足。**（3）**课题从税收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两个角度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式评估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体现了对现有研究方法的补充。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框架**

课题研究主体为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过程中梳理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治理安排、探究了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治理面临的问题，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优化策略。具体内容和研究框架（见图1.1）如下：

**图1.1 研究框架图**

第一章为导论。本章首先阐述了课题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从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以及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两个维度梳理相关文献，并做出简要评述。最后总结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本章首先从技术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最优税制和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出发，捕捉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特点，构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基础。然后再从税收治理及税收治理的不同维度阐述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关假设。

第三章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特征事实表现。本章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特征事实。具体而言，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探究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状况，结果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其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企业营收能力具有显著优势。从研发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表现，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成果卓越，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加。其次，阐述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特征表现，具体从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收入情况和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安排两方面进行分析。税收收入情况的分析中，主要包括税收收入与数字经济规模、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收入以及税制结构等内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分析中，主要包括税收治理制度如何安排、税收治理方式如何执行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实施等内容。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税收治理制度、税收治理方式和税收优惠政策三个方面提炼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

第四章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制度视角。本章基于政府税收治理制度安排的视角，考察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两种基础性制度安排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过程中，首先，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探究税制结构调节效应的产生机制。其次，以税制结构为门槛变量，检验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加深对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协同作用的认知。最后，采用分组回归模型，探究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不同产权、成长期间和市场竞争强度的数字经济企业间是否具有异质性。**研究发现**，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提升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能够缓解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提升直接税占比主要通过缓解税负水平带来的融资约束加剧以及弱化税收负担引致的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间接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的提升，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不再显著。此外，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高速成长和市场竞争较强的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

第五章为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方式视角。本章从税务机关税收治理方式变革的角度，考察金税三期工程带来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过程中，首先，以各省份金税三期工程上线时间为节点，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化税收征管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和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成本是税收征管数字化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此外，在非国有以及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本章对全文的研究发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综合现状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优化策略。一是完善税收治理制度，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二是优化税收治理方式，改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环境。三是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政策精准度。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课题收集了大量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两个主体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根据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在此基础上探究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入探究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之间的关系。

1. 理论分析法。课题通过梳理技术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最优税制和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构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基础框架，然后从税收治理以及税收治理分维度阐述税收治理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其中，分维度一为多元税收治理主体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治理制度安排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分维度二为多元税收治理主体的税务机关如何通过税收治理方式执行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从而理顺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关系｡
2. 规范分析法。课题收集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和数字经济企业税收等相关数据，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现状和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治理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梳理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相关税收政策。
3. 实证分析法。课题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具体的，从税收治理制度以及税收治理方式两个细分维度评估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课题选取数字产业化行业作为研究样本，从创新效率的角度衡量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在税收治理制度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评估中，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税收治理的基础制度安排即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和协同机制。在税收治理方式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评估中，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金税三期改革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然后分别采用中介效应和分组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表现。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1.4.1 研究创新点**

1. 研究视角上，捕捉到数字经济企业发展考验着政府税收治理能力的重大现实议题，突破就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等单一视角来分析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治理的研究限阀，首次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全方位税收治理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既为观察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注入实践素材，又为解决税收治理如何有效契合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应景研究。
2. 研究方法上，有关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的税收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问题和对策层面，缺乏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定量分析。课题采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门槛回归等模型检验了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
3. 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大多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和纳税遵从等单一角度出发，探究税收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缺乏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系统研究。课题将政府与税务机关两个税收治理主体纳入同一研究体系，从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两个分维度，厘清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检验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提出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优化策略，这些成果可为政府设计出匹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税收治理改革方案提供参考。

**1.4.2 研究不足**

理论分析方面，有关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的逻辑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关于税收治理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路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以便形成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完备逻辑分析链条与框架。

实证分析方面，一是课题的研究对象为数字经济这一特定行业，样本企业数量较为有限。二是部分数字经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低、财务信息公开披露不足，对数据可得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样本数量相对较少。

案例分析方面，有待选一个数字经济企业标杆，解剖其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情况，可为政府甄别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治理情况提供微观佐证。

**第二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借助现代信息网络平台，依托信息与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企业则是数字经济形态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可将其定义为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现代化数字技术对信息、知识和人力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价值增值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数字经济企业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数字经济企业往往具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数字化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其二，数字经济企业具有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在运营过程中，数字经济企业通常可利用所具备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对市场、消费者和产品的深度挖掘与分析，进而优化企业运营效率。其三，数字经济企业往往以互联网平台为桥梁，将产业链的上下游紧密连接，从而打造完备的数字化生态系统。企业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多方面和多层次。本课题主要从技术层面定义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将其概括为数字经济企业通过改进和优化现有技术或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以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1.2 税收治理**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治理理念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与应用。本课题将税收治理概括为社会多元主体基于公平、公正原则，依托现代化数字技术，在税收活动中良好互动，以实现各主体利润均衡化。与税收管理相比，税收治理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在主体选择上，税收治理包含的主体更加广泛，不仅包括税务局、财政局和政府部门，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其二，在治理模式上，税收治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治理模式，治理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公正等原则。政府通过搭建税收信息平台，及时发布税收政策、法规和征管动态，提高纳税人对税收政策掌握度，从而克服了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税收管理模式弊端。其三，在征管技术上，税收治理突破了传统的“以票控税”的税收征管方式，强调“以数治税”，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税收数据质量的提升和数据共享。此外，政府还可通过对税收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实时掌握税收收入、税源分布、税收风险等信息，进而为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其四，在目标选择上，税收治理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为最终目的，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2.2 研究理论基础**

**（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由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三位经济学家提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各方所掌握的信息量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说，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在交易活动中更具主动性，而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卖方通常掌握更多信息。据此，卖方可通过传递信息来获得利益，而信息不足的买方也会主动寻求从对方那里获取更多信息。根据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其造成的后果可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可阐述为在市场中因信息不对称及价格下滑导致商品趋于劣质化，这一现象最常见于二手车交易市场中。道德风险则指经济个体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在保险市场中尤为常见。具体到税收领域，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出现在征纳双方主体之间。一方面，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对纳税人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信息掌握甚少；另一方面，征纳双方对税收政策的解读具有差异性。因而，税收的征收效能和公平性往往受到影响。

**（2）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理论最早呈现于拉姆齐的论文《最优商品税》中。最优税制是一种无法再通过改革进一步增进效益的状态，政府依据税收的社会影响及宏观经济效果，并综合考量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来确立最优的税种构成。在此过程中，政府力求达成税制的灵活性、税负的逐步调整、税收法规的稳定性以及税收政策的健全性等多重目标，旨在增强社会整体效能并提升国家的财政收益。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在税收征纳中往往处于信息劣势方而难以到达帕累托最优，只能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最优税制理论旨在帮助政府找到最优的税收制度安排，从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税收的效率性原则主要强调保持税收的非干预性，即确保税收不介入资源的自然配置过程，以避免对纳税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扭曲。换言之，理想的税收收入应仅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意味着资源仅从私人领域转移至公共部门，而不因个体行为调整而牺牲经济效率。至于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可阐述为对纳税人的课税额应与纳税人的经济收入相匹配。从促进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看，税负水平要遵循适度原则，不能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此外，税制结构应充分发挥其中性优势，避免其对市场资源配置造成干扰，从而促进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合理决策。

**（3）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众多国家面临经济滞胀和财政赤字等复杂问题，对传统的治理方式和管理模式带来了严峻考验，使得单一治理主体和线性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协同治理理论则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思路。该理论将治理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强调只有采用协同的方式，实现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紧密配合，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效果，进而提高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组织、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他们各自掌握着不同的资源，在治理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协商交流。协同治理的重点在于政府间的协同管理与调控，倡导政府运用政策调控、行政审核及司法监察等措施，以确保社会的公正性，并捍卫公共福祉。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成为常态，传统的税收征管手段得以优化，为税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工业经济基础构建的税收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收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协同治理为解决数字经济的税收治理问题提供了方向。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若政府、税务机关、企业和个人之间能够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目标一致，建立统一的税收治理体系，那么税收治理效率将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具体而言，协同治理对税收治理的启示与实践路径如下：一是强化跨部门协同，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税收管理。其中，政府作为税收治理的主导者，不仅要制定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为税收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而且还要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全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与遵从度。二是深化社会各方主体的合作，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协同的税收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税收治理效率的提升。

**（4）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最初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开创性地提出，其核心观点在于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型组合，通过构建全新的生产函数来推动经济发展。该理论深刻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此之后，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被应用于多样化的经济发展背景中。1956年，索洛等人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又称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型明确指出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企业能够凭借技术创新手段来提升生产效率，并缩减生产成本，进而促进经济的正向增长。1986年，罗默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突破了将技术进步视为外部因素的局限，强调技术进步是由经济体内部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基于此，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推动经济增长。1989年，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该理论强调国家在创新活动中所起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相较于个人或企业创新，以国家为主导的创新活动更能有效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资源调配的灵活性，并扩大创新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强力推进创新产业发展，实现规模经济。数字经济企业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兴行业，数字技术创新是其创新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数字技术已实现与各领域和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其普惠性和广辐射性特征愈加显著，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技术的引擎，其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水平更高、不确定性更大。因此，我国要使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必须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实现各类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主体的紧密协作和良好互动。

**（5）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它通常指的是某项经济活动对他人及社会产生的后果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价格信号来充分体现。依据其产生影响的性质，外部效应可以被划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经济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给其他人或社会带来了额外利益，而受益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后者则指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使其他个体或社会利益受损，而该经济个体却无需承担任何额外成本。外部性的存在会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进而引发效率上的损耗。此时，政府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来矫正外部性，以限制或鼓励某些经济行为。比如对负外部性行为征收庇古税以及对正外部性行为给予财政补贴。技术创新是一种被认为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活动，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社会研发投资通常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数字经济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也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行业之一，不仅能够带动其他行业和企业的效率提升，而且还能推动其他行业向新发展。因此，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所产生的正外部性相较于一般企业更大。鉴于此，政府要持续关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积极性，通过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等各种手段缓解其创新压力，减少其研发创新成本。

**2.3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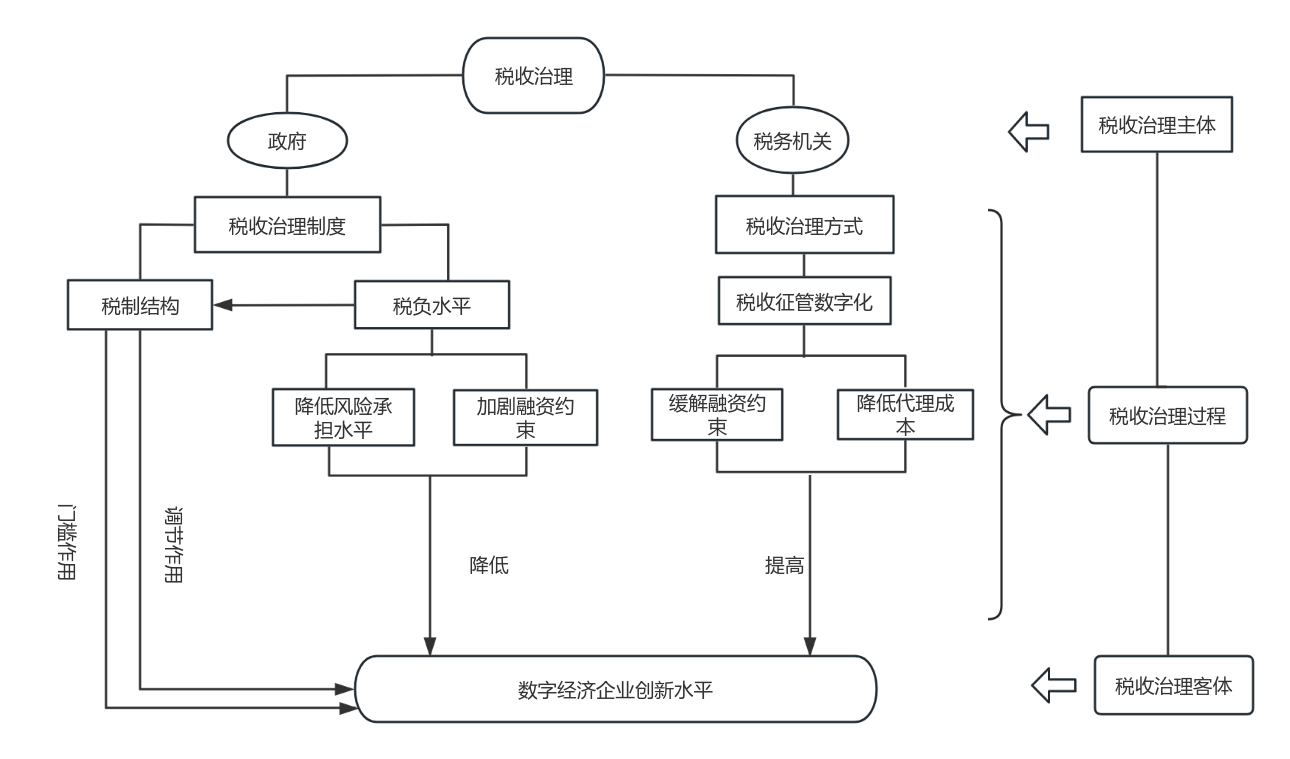
税收治理是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抓手。税收治理是一个涵盖多元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征税机关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各治理主体之间分工明确、协作密切，通过良好的互动机制，致力于实现针对不同客体的治理目标。在税收治理的推进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责在于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治理制度，为税收治理奠定良好基础。税务机关则负责采用合理、高效的税收治理方式，确保税收政策的高效实施。具体到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过程，政府和税务机关以推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为共同目标，运用税收治理手段共同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体而言，政府通过优化税收治理制度，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提供基础性政策支撑；税务机关则通过创新税收征管技术、革新税收征管方式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治理效率。综上可知，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构成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税收治理的基础和骨架。鉴于此，本课题在厘清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进一步从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两个分维度出发，深入探究其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

**2.3.1 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良好的税收治理能力有助于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推动国家创新水平提升。一方面，税收治理能够起到外部监督作用，改善企业委托代理行为。提高税收治理水平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性，不仅有助于规范企业纳税（Balakrishnan et al.，2011）[76]，而且可以抑制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在实践中，企业为了达到避税目的，会增加企业财务信息的理解难度，加剧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抬升企业委托代理成本（Biddle et al.，2019）[77]。完善的税收治理能够实现对公司多方面、全过程的监督，提高了企业避税成本，从而削减企业利用不透明信息进行交易的动机。同时，税收治理的过程也加强了对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的监督，抑制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挖空，从而减少企业委托代理成本。

另一方面，税收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税务机关推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税收压力，增加企业现金流，进而提升企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企业的创新行为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因素，充足的资金和高水平的运营资金管理能力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关键。由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创新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较高的税负无疑会侵占企业的研发经费，进一步增加其融资难度。当税收治理水平较高时，政府可以更加精准识别税收优惠企业和锁定税收优惠行业，确保研发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得以充分落实于企业，以减轻其在研发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资金负担。由此可见，税收治理能力越强，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越显著，越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2.3.****2 分维度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图2.1 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图2.1显示，在税收治理的逻辑框架中，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构成了税收治理的基础和骨架。具体而言，税收制度涵盖了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两大核心维度。一方面，税负水平作为税收制度的基础指标，其设定的合理性对税收制度的科学性至关重要，深入探究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机理，不仅能够为政府制定税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确保税负维持在既促进财政稳健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合理区间，还为优化税收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税制结构是税收收入中各税种的结构组成，影响着税负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传导效率，不断优化税制结构是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关键环节。因此，深入探究税制结构在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于增强政策协同、提高税收治理的创新促进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税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推动税收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动力，在税收管理向税收治理转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对于加快构建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理清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可为提升税收治理技术水平，构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税收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1）税收治理制度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税负水平是税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较高的税负水平会抑制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企业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形态，相较于一般企业，其创新活动所面临的风险水平更高、不确定性更大，并且持续时间更长。而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资金筹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税收负担减少了数字经济企业留存收益和自由现金流，使得企业内部融资能力下降，当数字经济企业面临较大研发投资压力时，外部融资成为解决资金不足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在长时间内势必对企业成长性造成不良影响，并进一步降低其在资本市场的信用等级。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也会对其实施更严格的信贷条件，这将会增加数字经济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不利于延伸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降低税负有助于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减税降费所带来的数字经济企业现金流增加和投资回报率提升，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增强研发创新活动的持续性；而且还可以改善投资预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管理者信心，并促成风险较高的研发项目。此外，减税降费向市场传递的多重积极信号还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企业信用等级，畅通外部融资渠道，进而提升资源配置灵活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总之，税负水平过高会制约数字经济企业获取研发投入资金，降低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课题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税负水平越高，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越低，即提高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负面影响。**

税制结构是税收收入的结构组成，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税制结构是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能否转嫁为标准，可将税负划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资源税，税收来源渠道较广，通常存在于商品流通环节，较易实现转移；而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税负难以转移。优化税制结构，提升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负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一方面，提升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能够缓解税收负担带来的融资约束加剧。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形成于数字产品或服务流转过程中，贯穿于企业数字创造的始终，尽管增值税可以部分转移给消费者，但难以完全转移。因此，间接税会大量挤占数字经济企业现金流，加剧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不利于研发创新持续进行和创新效率提升。而所得税以“事后征收”为特点，不参与企业数字产品的价格构成，只参与数字经济企业利润再分配，影响数字经济企业的预期收益和净利润率。相比之下，直接税仅对数字经济企业预算约束线的水平位置产生影响，而间接税则改变了其斜率。因此，在税负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越高，对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越小。

另一方面，提升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能够弱化税收负担引致的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一般来说，直接税在数字经济企业实现盈利后进行征收，而间接税的征收与盈利无关，只要企业发生数字产品增值就需要缴纳税费。对政府而言，所得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增值税则是稳定的收入来源。鉴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实际上分担了部分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有助于数字经济企业实现预期收益，并激发其创新动力。由此可见，与增值税相比，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更小。换言之，在税负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占比越高，所引致的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程度越小。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发达国家间接税占比保持在40%左右，而我国间接税比重接近70%，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优化空间。在此背景下，优化税制结构与降低税负水平相结合，能够形成政策协同效应，更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基于此，本课题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税制结构在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起正向调节效应，提高直接税占比能够缓解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2）税收治理方式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税收征管是指税务机关依法对税收活动的征收、缴纳和监管等环节进行的管理活动。其作为国家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手段，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金税三期工程的推行革新了税收管理框架，增强了税收监管的强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税务机构的监督角色，显著提高了跨部门协作与治理效能。现有研究证实，加强税收征管能够有效遏制企业违规行为（纪亚方，2023）[78]，并增进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王丽 等，2023）[79]。此外，这一措施还能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刘忠 等，2019）[80]，以及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童锦治 等，2016）[81]，进而减轻企业的融资限制（蔡昌等，2021）[82]。企业研发创新作为运营过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将会受到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其一，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带来治理优势，缓解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后，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强度显著提升（Hanlon et al.，2014）[83]，使得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更加透明。金融机构可凭借多渠道信息来源，全面评估企业征信状况，从而在资本供需双方发挥“桥梁效应”，降低数字经济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化税收征管，税务机关能够达成精确执法与优质服务的目标。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企业备受国家重视，是政策扶持与优惠的主要受益者，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依托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政府能够精确定位税收优惠行业以及甄别优质企业，同时企业也可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加便捷地了解税收政策，进而保障数字经济企业能够充分享受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樊勇等，2020）[84]，拓宽了企业研发创新资金的来源渠道。另外，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还增强了税务机关执行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率，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务处理成本。

其二，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带来监督优势，减少数字经济企业代理成本。新兴技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创新具有高风险性，在目标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倾向于最大化企业的即期利润，而对于耗时较长的研发投资活动则持保守态度（刘胜强等，2015）[85]。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金税三期工程，实现了信息的交叉审核与相互验证，有助于全面洞察企业的经营状况（Zhu，2019）[86]，从而强化了对企业利润的监管。同时，税收征管数字化进一步扩大了监管范围，加强了对企业管理层薪酬和激励制度的审查力度，有效抑制了管理者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此外，数字化征税也为监督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情报，大数据技术提高了信息整合能力和获取质量，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并遏制大股东对企业资源的侵占和挖空行为，改善企业内委托代理关系（曾亚敏等，2009）[87]。

总之，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与人、物与物、组织间单一的连接方式，构建了一个交互式、多维度的信息交流环境，促进了信息的多元化协同处理。这一变革助力企业获取更为丰富且独特的“非同质化”信息，优化了企业的运营与管理效能，显著减少了数字经济企业在研发创新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对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由此，本课题提出假设3：

**H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即金税三期工程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三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特征事实表现**

**3.1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特征表现**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态持续向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GDP比重也不断攀升。《2024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3.9万亿元，同比增长3.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图3.1报告了我国2017—2023年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2017—2023年期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长至53.9万亿，增幅约达98.2%；同时，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也从32.9%上升至42.8%，占比增长了约9.9个百分点。图3.2报告了我国2017—2023年GDP与数字经济增速情况。从图中可知，2017—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4%以上，均高于同期GDP增速，其中2018、2020和2022年数字经济增长率达到GDP增长率的3倍以上，充分体现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图3.1 2017—2023年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万亿，%）**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图3.2** **2017—2023年GDP与数字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数字经济企业营收能力具有显著优势。《2023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TOP500榜单数字经济企业平均营业收入达到12921.5亿元，同比增长率为6.7%，其中超过万亿的企业共有8家、超过千亿的企业共有137家。2023年TOP500榜单上市企业与A股上市企业利润对比情况如图3.3所示。从成本的角度来看，2023年A股上市企业利润率和净利率分别为10.9%和9.7%；而数字经济榜单企业的利润率和净利率分别为16.9%和13.8%，分别超过A股上市企业6.0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从收入的角度来看，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和净利率分别为10.9%和9.0%；而数字经济榜单企业利润率和净利率分别为12.2%和9.9%，分别高于A股上市企业1.3和0.9个百分点。通过上述对比，充分说明了数字经济企业在营收能力上的显著优势。



**图3.3 TOP500榜单上市企业与A股上市企业营收比例（%）**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报告》。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加。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TOP500榜单企业研发费用达到13633.3亿元，占我国同期研发费用的40%左右，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图3.4报告了我国2022年和2023年数字经济上市和非上市榜单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图中可以看出，2023年非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2.9%和2.3%，非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上市企业。从研发投入增长的角度看，非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增长迅猛，2023年的研发投入强度较2022年提升了1个百分点，而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则下降了0.1个百分点。对比结果揭示了非上市数字经济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积极性，预示着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释放。



**图3.4 上市和非上市数字经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报告》。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成果卓越，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加。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2024）》可知，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0.6万件，约占全球总量的45.7%。图3.5报告了我国2016—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授权量及占我国专利授权比重。由图可知，2016—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持续增加，占我国发明专利授权比重不断提升。发明专利数量由2016年的12.4万件增长到2023年的40.6万件，年均增长约4.0万件。同时，占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由2016年的30.6%增长至2023年的44.1%，年均增长约1.9%。上述数据充分说明了数字经济企业在我国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图3.5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及占比（万件，%）**

数据来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2024）》。

**3.2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特征表现**

**3.2.1 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收入状况**

为探究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收入状况，首先从宏观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和税收收入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选取了2017—2023年数字经济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数据进行对比。从图3.6可以看出，在2017—2023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为正，年均增长率为14.2%，相比之下，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6.1%，远低于数字经济增长率，且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和2022年税收收入增长率为负。以上数据说明，数字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长之间并没有相关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我国数字经济总体税率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目前有关数字经济的税种不完善、部分税种尚未涉及；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企业大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

**图3.6 2017—2023年数字经济与税收收入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表3.1 2021年上市数字经济企业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字经济行业 | 企业 | | 营业收入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
| 数量（个） | 比重（%） | 金额（亿元） | 比重（%） | 金额（亿元） | 比重（%） |
| 数字产品制造业 | 1180 | 21.77 | 64718 | 9.71 | 2175.45 | 5.23 |
| 数字产品服务业 | 203 | 4.00 | 8349 | 1.25 | 254.34 | 0.61 |
| 数字技术应用业 | 178 | 3.51 | 6247 | 0.94 | 352.57 | 0.85 |
| 数字要素驱动业 | 190 | 3.74 | 23788 | 3.57 | 859.03 | 2.07 |
|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 3399 | 66.98 | 563496 | 84.53 | 37935.03 | 91.24 |
| 总 计 | 5075 | 100.00 | 666598 | 100.00 | 41576.42 | 100.00 |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税收发展白皮书》。

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收入状况。依据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将数字经济企业划分为五大类型。表3.1报告了2021年五类数字经济上市企业的数量、营业收入和税费情况，其中前四类又被归属为数字产业化行业，最后一类为产业数字化行业。由统计结果可知，数字产业化行业的企业数量占比、营业收入占比和各项税费占比分别为33.02%、15.47%和8.76%，而产业数字化企业的占比分别为66.98%、84.53%和91.24%。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数字产业化企业大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较多，因而数字产业化行业的税负水平相对较低。而产业数字化行业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行业，其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较为有限。同时，大多企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会被征收一定的消费税或资源税，因此税负水平相对较高。

**图3.7 2011—2023年直接税与间接税税收收入及比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税制结构是税收收入中各种税收收入的组成。为深入了解我国税制结构现状，本课题进一步收集了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数据。考虑到个别税种数据难以获得，参考邝嫦娥等（2024）的做法[88]，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主要税种作为其测算指标。其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间接税方面，由于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2016年及之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6年之后则调整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图3.7报告了2011—2023年我国直接税、间接税收入水平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情况。整体上看，2011—2023年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均呈增长趋势，间接税仍处于主导地位，但直接税占比正逐步提高，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由2011年的50%左右提升到2023年的70%左右。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和2022年我国间接税收入均有所下降，但直接税收收入受到的冲击较小，仍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然而，在2023年我国直接税收入也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3.2.2**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安排**

不同的经济时代适配不同的税收治理方案，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配的税收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性热点话题。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但工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呈现纯粹的数字经济模式和融合实体经济的数字经济形态并驾齐驱的势态。因而税收治理方式暂时无需做出颠覆性创新，但应该适度调整与优化当前税收治理制度，使之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近年来，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政府主要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税收优惠政策安排等方面进行优化改革，旨在构建与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相匹配的税收治理体系。

**（1）****税收治理制度如何安排**

近年来，为了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我国始终秉持着“结构性”减税降费的政策主基调，并致力于通过优化税制结构缓解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税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增值税和所得税两方面。

在增值税方面，政府实施的政策改革如下：我国传统的税制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就营业税的征收方式而言，为企业带来大量重复征税项目，大大缩减企业盈利空间，严重制约企业创新发展。为优化税收制度，解决重复征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于2012年在上海开展“营改增”试点工作，并于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落地实施。这一政策历史性地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税负压力，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继“营改增”政策之后，我国政府又相继进行了三次增值税税率调整。2017年，政府为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税收征收效率，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简化税制。经调整后，原存的17%、13%、11%及6%四档税率被简化为17%、11%和6%三档。2018年，政府再次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将前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为16%和10%。2019年，政府进一步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又分别将原来的16%调整为13%，10%调整为9%。此外，我国于2023年出台了针对集成电路和先进制造业等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允许相关企业在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基础上，加计15%抵减应纳增值税额。

在所得税方面，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所得税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2008年，我国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税率，并将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调整为25%。有关数字经济行业的所得税改革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方面。一是针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施了15%的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二是针对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以获利年度为基准，分别在第一至两年和第三至五年给予免征和减半征收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待遇。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9年，我国在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将基本减除费用增加至5000元，并设立了专项附加项目，允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与教育、医疗保健、居住以及养老等特定专项相关的费用支出。此外，个人所得税的部分税率区间得到了优化调整，具体措施为扩大了3%、10%和20%三个较低税率区间的级距，同时缩减了25%税率区间的级距。数字经济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高新技术企业范畴内尤为显著。依照国家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员获得股权奖励或企业向个人股东转赠资本的，若纳税人难以一次性缴纳税款，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五个自然年度内分期缴税。

**（2）税收治理方式如何实施**

在税收征管制度方面，我国政府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改革，致力于提升税收征管效能。随着“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和“金税三期”工程的推进，原有的税收征管体制弊端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低、税收征管成本高。在此背景下，政府着力进行税收征管优化改革，国地税合作不合并方案于2015年被正式提出。此次改革主要围绕征管职能划分、优化服务、征管方式转变以及推动税收共治等方面进行，旨在进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但是由于缺乏系统配套的相关制度和有效的奖惩措施等原因，此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征管所面临的问题。在此之后，政府于2018年开始实施国地税合并改革，此次改革实现了省级及其以下国地税机构的合并，并对执法标准和征管制度进行规范和统一。国地税合并推动了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缩减了征税成本，促进了我国税收征管的统一。2021年，政府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水平，提升执法精确性，中共、国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为税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以上改革政策可以看出，我国税收征管始终贯彻系统理念，坚持税收征管改革与税制改革协同推进。

在税收征管方式上，税务机关持续推动税收征管方式创新，加强科技赋能，大力推动智慧税务建设。2013年，金税三期项目率先在山东省、山西省及重庆市试点运行，随后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最终于2016年10月全面部署完成。该项目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迈入数字化征税的新纪元，对推动我国税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金税三期实现了涉税信息的多层次交互与整合，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转型。金税三期以“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为核心目标。其中，“一个平台”是指构建连通各级税务机关及与其他部门的技术基础平台。两级处理强调以“一个平台”为基础，在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级税务局设立数据处理枢纽，以此来提升税务管理的精确性与时效性。三个覆盖是指应用信息系统逐步覆盖所有税种、渗透到税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并实现各级税务机关的信息共享。四个系统则指经过业务流程的重新配置与优化，逐步构建起一个核心聚焦于征收管理与外部信息交互，同时涵盖行政管理、决策支持等辅助职能在内的综合性信息管理应用体系。相较于金税一期和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在征税信息管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前正在实施的金税四期是金税三期的延续与进阶，旨在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现代税收体系。该项目自2021年启动，并于2023年在广东、上海、内蒙古等十地率先推行。金税四期将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纳入了公安机关、金融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至其核查体系之中，以期实现对企业的全方位监督与管理。在推动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金税四期工程采用了多项创新技术，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可视化呈现、语音交互及智能分析技术的应用，金税四期构建了一套先进的多方音视频通讯平台，不仅提供了高效的线上沟通与协作功能，还实现了跨层级、跨区域的实时互动，极大地拓宽了税收管理的覆盖面。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税收乱象，政府也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措施。政府对数字经济税收监管实践政策安排如下：一是政府加大了对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洼地”现象的治理力度。近年来，大量数字经济企业利用集团优势和关联交易使得应纳25%的较高企业所得税率变为处于“税收洼地”的15%的低所得税率。鉴于此，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措施，展开了对“税收洼地”的专项治理。2020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该政策强调只有在当地注册并实际运营的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缩减了数字经济企业利用集团优势和关联交易进行逃税、避税的空间。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着重强调了对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区域或关联企业交易进行避税行为的预防性制度构建，进一步遏制了数字经济企业关联方交易中的逃税与避税现象。

二是加大了对平台经济的专项治理力度。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平台经济应运而生，其本质是一种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的新兴经济业态。与传统经营模式相比，平台经济的虚拟性和碎片化特征突出，给税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平台经济的税收乱象，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例如，沣西新城税务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组建了平台企业税收管理服务专项工作组，并编制了《平台企业常态化税收管理监管手册》，旨在建立涵盖从平台取得资质到常态化监管的全流程跟进监管模式，加强对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征集和监管。为进一步规范平台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经营者和管理人员的涉税信息，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力打击了平台经营者的虚假申报及偷税、漏税行为。有助于税务机关更准确地掌握平台企业的税收情况，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三是税务机关加大了对网络主播的稽查力度。网络直播是数字经济发展所催生的新兴经济业态。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网络直播一直处于税收领域的“灰色地带”，网络主播通过隐匿个人收入或改变收入等途径逃避税收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加强对网络直播领域的税收监管成为税务机关的重点工作。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税务机关提高了对网络直播领域的“双随机、一公开”比例，其中“双随机”是指抽取主播和检查人员的随机性，“一公开”是指将检查结果以电子形式在网上进行公开。上述措施有效增强了对网络直播领域的监管力度。2021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指出加强对文娱从业者的税收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相关从业人员的偷税、漏税行为，对网络主播个人工作室采用查账征收的方式进行纳税。2021年11月，商务部在颁布的《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中，对电商直播的基本要求做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电商平台资质、经营条件以及合规性等。在此引导下，各地税务机关相继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对网络直播领域的税收乱象进行治理。

**（3）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是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的有效手段，在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税收优惠体系。数字经济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着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同时也是国家税收政策激励和扶持的重点对象。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等领域。数字经济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梳理如表3.2所示：

**表3.2 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  |  |  |
| --- | --- | --- | --- |
| 分类 | 政策 | 时间 | 内容 |
| 企业所得税优惠 | 技术转让所得减免 | 2015年 | 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免征所得税，超过5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所得税。 |
| 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 | 2018年 |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 |
|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 2018年 | 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度由5年延长至10年。 |
|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2023年 | 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在税前按实际发生额10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可按无形资产价值的200%在税前加计摊销。 |
|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 2023年 | 新购置的不超过500万元单位价格的设备和器具，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
| 个人所得税优惠 | 技术人员股权激励优惠 | 2016年 | 企业技术人员获得股权奖励的，可在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分期缴纳所得税款。 |
| 向个人转增资本 | 2016年 | 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采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及资本公积的，个人可在不超过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
| 增值税优惠 | 免征增值税 | 2016年 |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
| 增值税留抵退税 | 2017年 | 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制造业以及科学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 |
| 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 | 2021年 | 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新型显示企业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重大技术装备生产和核电项目业主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
| 增值税加计抵减 | 2023年 | 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 |

**3.2.3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

**（1）税收治理制度的问题**

税收原则和税收管辖受到冲击。首先，在税收原则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税收归属规则和国际税收体系中的常设机构认定带来了干扰。税收属地原则最初是基于纳税人的地理位置来确定税收管辖权的标准。在数字经济的虚拟化和远程性交易活动中，交易主体和交易地点表现出隐秘性和流动性等特征，使得地域归属模糊，税收属地原则难以适用。更为严重的是，为逃避税收纳税义务，纳税主体往往选择“税收洼地”作为数字经济的税收征收地，从而导致数字经济的跨区交易和税收收入的集群，传统税收属地原则在此情境下难以促进税源的均衡分布。其次，数字经济对税收管辖权和税收收入归属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经济的跨区域和流动性强等特征难以适配原有的以机构注册地为标准的税收管辖权和收入归属原则。数字经济可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交易，若按照传统的税收收入划分原则，地方政府无法征收本地顾客与异地企业的销售所得税。在此情况下，企业营业利润与税收收益的平均分配难以实现，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合理配置亦无从谈起，势必会严重阻碍经济落后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

税制结构不合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基于工业经济构建的税制结构难以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税系层面和税种层面上。其一，在税系结构层面，当前我国税制结构中间接税占比过高，不利于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世界货币组织调查数据显示，间接税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间接税占比越低。当前发达国家间接税占比保持在40%左右，而我国间接税比重接近70%，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激励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必然选择。其二，在税种层面上，数字经济对流转税和所得税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流转税而言，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方式对传统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流转形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流转课税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进而对流转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就所得税而言，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下，随着知识和技术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地位不断提升，个人收入的比重也逐渐提高，且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相比之下，企业收入的占比则有所下降。在此影响下，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构成也有所改变。因而，税制结构的调整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影响。

税制要素难以有效锁定。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运行载体的新型经济业态，其交易模式具有网络化、虚拟化和远程化等特征。这一新兴经济模式对传统的税制带来了冲击，使得税制要素难以有效锁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纳税主体和课税对象界定困难。在数字经济模式下，供给侧呈现产业融合和供给主体分散化等特征，且市场经济活动涉及的产业多、领域广，这使得税收主体的界定难度大大增加。此外，数字经济活动一般不通过实体资产转移，而更多涉及无形资产或数据流转，被认为是一种附加值增量经济，因而课税主体往往难以明确划分。二是税基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价值生成存在不确定性，且其价值归属界定较为模糊。考虑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构建数据价值化与资本化的价值评估体系面临挑战。当前，数字经济活动相关数据的获取渠道较为有限，数字产业的转型与产业的数字化升级缺乏充足的数据支撑。同时，在对数字经济价值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尚未确立精准科学的价值核算体系，最终导致原有的税基规模缩小。其二，数字经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边界模糊导致税基被进一步低估。在数字经济活动中，消费者逐步加入商品生产或研发过程中，成为“生产型消费者”，消费者由此产生的个性化需求满足收益难以估算，从而进一步低估税基规模。

**（2）税收治理方式的问题**

税收征管水平亟待提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商业模式的特征体现为订单获取方式的多元化、服务供给模式的综合交融，以及产业价值链结构的繁复性。这使得纳税主体与税务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愈发明显，税源监管难度大幅增加，基于传统商业模式的税收征管滞后于数字经济模式的发展。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务机关的技术手段有待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税收缴纳方式的多样性和便捷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税收数据的采集工作智能化水平偏低，对人工依赖较大，在税务申报、税务注册等多个系统之间，需要利用多种不同的接口来实现数据的录入与导出，从而导致税收治理基础数据的分散化和无序性，难以与数字经济的及时性、虚拟性和跨区域性相适应。税务机关亟须提高“以数治税”水平，充分发挥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作用，以深化涉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抓手，提升纳税服务品质与税收征管效能。二是税务机关尚未与第三方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其信息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经济业态，如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使得传统的代扣代缴机制失效。这两类经济的个税代扣代缴义务人转变为第三方中介平台，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滞后，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履行代扣代缴的法定义务，因而税务机关在尝试通过第三方服务平台获取所得税缴纳者的相关数据时面临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纳税人避税提供了潜在机会，最终导致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严重。

**（3）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

一是企业认定条件严格，税收优惠门槛高。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等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认定条件严格、税收优惠门槛高等问题。以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软件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为例，企业需要满足研发人员数量、产品销售收入、工作人员学历构成等条件才能享受相关税收优惠。这一税收优惠主要适用于高、精、特、新等头部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无法达到税收优惠政策门槛。此外，对于研发创新活动的界定也过于严格。例如，财税〔2015〕119号文件中所涉及的研发活动具有严格的限制，企业必须在技术和知识应用方面有重大进步，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满足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一般企业创新活动往往难以达到相关要求，税收优惠政策普适性较低。

二是间接税税收优惠较少。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多为直接税。与直接税相比，间接税贯穿企业研发创新的始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较为深刻。对于数字经济企业来说，间接税税收优惠不仅能够带来税后净利润的增加，而且能够降低研发创新活动成本，由此可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叠加。但是，目前针对研发创新的间接税优惠较少，仅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等政策。

三是缺乏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关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软件研发企业以及集成电路企业等领域。数字经济产业涵盖了计算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目前尚没有针对上述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导致数字经济企业相关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不全面，部分数字经济企业难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制度视角**

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是税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于此，本章以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为切入点，探究税收治理制度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检验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及税制结构在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所起的调节效应，为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其次，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方面深入探究税制结构调节效应的产生机制。然后，为进一步加深对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政策协同的理解，又以税制结构为门槛变量，考察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最后，再从企业性质、企业成长性和市场竞争水平三个方面探究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4.1 研究设计**

**4.1.1 模型构建**

为探究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税制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课题构建了以下两个模型。

 其中，Te代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Tax\_1代表数字经济企业的税负水平；Tax\_2代表数字经济企业所在省份（市）的税制结构；Tax\_1\*Tax\_2为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的交乘项；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合集；i、t和p分别代表企业、年份和行业，σ、μ和ν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4.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章主要从税收治理制度的两个层面即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角度分析其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样本聚焦于A股数字经济上市企业。目前数字经济企业被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类别，考虑到数据的精准性及可得性，本课题选取2011—2022年部分数字产业化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数字产业化企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为避免数据误差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本课题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又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ST股和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2）针对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进行填补；（3）对连续型数值数据实施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73家企业，共3276个观测样本。本课题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统计年鉴》。

**4.1.3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水平（Te）。目前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测算大多基于创新投入或产出的角度。鉴于以上衡量方式只包含投入或产出单一方面因素，存在一定的局限，故选取创新效率作为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本课题考虑到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可在不知具体生产函数形式的情况下，进行多投入与多产出的效率测算。因此，参考胡元木（2012）的做法[89]，选用DEA测度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效率。其中，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分别为企业研发费用的自然对数和企业申请专利数的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税负水平（Tax\_1）。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所得税税率衡量企业税收负担，考虑到此方法忽略了增值税等流转税对税负水平的影响，参考李青原等（2022）人的研究成果[90]，采用企业所支付的税费总额减去收到的税费返还，然后除以营业收入衡量数字经济企业税负水平。依据我国会计准则，在现金流量表中，企业所“缴纳的各项税款”与其所“获取的税收返还”之间的差额，构成了企业净税收支出，同时，考虑到企业缴纳税费的税基以主营业务收入为基础，因此选择营业收入作为分母。

**（****3）调节变量**

税制结构（Tax\_2）。借鉴余红艳和沈坤荣等（2016）人的做法[91]，从税种结构的角度衡量税制结构，具体为各省份（市）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的比值。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划分以税负是否能够转移为标准，若税负不能转移则为直接税，反之则为间接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直接税选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主要税种。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2016年之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6年及以后间接税范围调整为增值税和消费税。

**（4）控制变量**

为避免数字经济企业其他方面因素对企业创新水平带来的影响。借鉴魏志华等（2022）的做法[92]，在模型中加入了多个企业特征相关变量，主要包括：

公司规模（Asset），具体为企业的资产总额加1的自然对数，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在资本市场获得投资的机会越多，研发投入资金越充裕，创新水平也相对较高。负债水平（Lev），采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一般而言，负债水平越高，面临的研发投入资金不足问题越严重，越不利于企业创新。股权集中度（Top10），采用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比重表示。管理费用率（Mag），用企业管理费用支出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一般而言，管理费用率高表明企业管理效率低，资源配置相对不足，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权性质（Soe），若企业为国企则取为1，否则取为0。

**表4.1 变量定义**

|  |  |  |  |
| --- | --- | --- | --- |
| 变量类别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被解释变量 | 企业创新水平 | Te | 企业创新效率（DEA测算） |
| 解释变量 | 税负水平 | Tax\_1 | （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 |
| 调节变量 | 税制结构 | Tax\_2 | 直接税/间接税 |
| 控制变量 | 公司规模 | Asset | 企业资产总额加1的自然对数 |
| 负债水平 | Lev | 总负债/总资产 |
| 股权集中度 | Top10 | 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比重 |
| 管理费用率 | Mag | 企业管理费用支出总额/营业收入 |
| 企业产权性质 | Soe | 若企业为国企则取为1，否则取为0 |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2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由结果可知，企业创新效率（Te）的均值为0.376，标准差为0.16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98和0.830。说明不同数字经济企业间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不同企业间所拥有的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差距较大，不同行业之间的创新难度也有所不同。税负水平（Tax）的均值为0.03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76和0.159，由此可知，不同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负也存在较大差距。考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所实施的差异化税收政策导致不同类型企业承担的税负水平有所差异。税制结构的均值为0.524，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当前税制结构的特点，即以间接税为主。

**表4.2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样本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Te | 3,276 | 0.376 | 0.167 | 0.198 | 0.830 |
| Tax\_1 | 3,276 | 0.038 | 0.040 | -0.076 | 0.159 |
| Tax\_2 | 3,276 | 0.524 | 0.224 | 0.198 | 1.302 |
| Asset | 3,276 | 21.939 | 1.207 | 19.337 | 25.665 |
| Lev | 3,276 | 0.346 | 0.182 | 0.040 | 0.787 |
| Top10 | 3,276 | 52.350 | 15.861 | 18.680 | 92.330 |
| Mag | 3,276 | 0.131 | 0.101 | 0.014 | 0.615 |
| Soe | 3,276 | 0.155 | 0.362 | 0 | 1 |

**4.2.2 相关性分析**

为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又进行了pearso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3所示。由结果可知，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6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过重会抑制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38，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呈正相关，提高直接税占比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负债水平和产权性质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费用率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

**表****4.3 相关性分析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Te | Tax\_1 | Tax\_2 | Asset | Lev | Top10 | Mag | Soe |
| Te | 1 |  |  |  |  |  |  |  |
| Tax\_1 | -0.265\*\*\* | 1 |  |  |  |  |  |  |
| Tax\_2 | 0.238\*\*\* | -0.038\* | 1 |  |  |  |  |  |
| Asset | 0.741\*\*\* | -0.271\*\*\* | 0.205\*\*\* | 1 |  |  |  |  |
| Lev | 0.437\*\*\* | -0.387\*\*\* | 0.033\* | 0.504\*\*\* | 1 |  |  |  |
| Top10 | -0.104\*\*\* | 0.135\*\*\* | -0.215\*\*\* | -0.129\*\*\* | -0.177\*\*\* | 1 |  |  |
| Mag | -0.278\*\*\* | 0.343\*\*\* | -0.006 | -0.331\*\*\* | -0.307\*\*\* | 0.038\* | 1 |  |
| Soe | 0.275\*\*\* | -0.125\*\*\* | -0.136\*\*\* | 0.221\*\*\* | 0.155\*\*\* | -0.071\*\*\* | -0.104\*\*\* | 1 |

**4.2.3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又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表4.4报告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可见所有变量的VIF值均未超过10，这一结果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4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变量 | VIF | 1/VIF |
| Tax\_1 | 4.24 | 0.236 |
| Tax\_2 | 1.67 | 0.598 |
| Asset | 1.56 | 0.640 |
| Lev | 1.54 | 0.648 |
| Top10 | 1.08 | 0.926 |
| Mag | 1.26 | 0.793 |
| Soe | 1.08 | 0.922 |
| Mean VIF | 1.78 | |

**4.2.4 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前，本课题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来确定模型的具体类型。由检验结果可知，豪斯曼统计量为26.61，且在1%水平下显著，故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5所示，回归过程均固定了企业、行业和年份效应。其中，表4.5列（1）和列（2）报告了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列（1）中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税负水平，可见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38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可见税负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306，且显著性水平不变。以上结果表明，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负面影响，税负过高不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可用现金流具有挤出效应，使得企业内部可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大大缩减；另一方面，税收负担会增加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成本，减少研发创新收益，从而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持续性。据此，政府应适当降低数字经济企业税负以激励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假设1得证。

**表4.5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税负水平 | | 税制结构调节效应 | |
| 1. Te | 1. Te | 1. Te | 1. Te |
| Tax\_1 | -0.385\*\*\* | -0.306\*\*\* | -0.788\*\*\* | -0.702\*\*\* |
| (-3.53) | (-3.00) | (-5.34) | (-3.48) |
| Tax\_2 |  |  | -0.008 | -0.011 |
|  |  | (-0.18) | (-0.28) |
| Tax\_1\*Tax\_2 |  |  | 0.840\*\* | 0.824\*\* |
|  |  | (2.23) | (2.47) |
| Asset |  | 0.076\*\*\* |  | 0.076\*\*\* |
|  | (10.06) |  | (10.47) |
| Lev |  | 0.012 |  | 0.013 |
|  | (0.49) |  | (0.49) |
| Top10 |  | -0.000 |  | -0.000 |
|  | (-0.04) |  | (-0.00) |
| Mag |  | 0.018 |  | 0.018 |
|  | (0.29) |  | (0.29) |
| Soe |  | 0.017 |  | 0.017 |
|  | (0.40) |  | (0.41) |
| 企业、行业和年 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0.332\*\*\* | -1.284\*\*\* | 0.339\*\*\* | -1.276\*\*\* |
| (10.73) | (-8.33) | (9.45) | (-8.18) |
| 样本量 | 3,276 | 3,276 | 3,276 | 3,276 |
| R² | 0.085 | 0.485 | 0.071 | 0.472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表4.5列（3）和列（4）报告了税制结构对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结果。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见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的交乘项系数为0.840，且在5%水平上显著；列（4）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乘项的系数为0.824，显著性水平不变。上述结果表明，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直接税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相对间接税较小，在税负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直接税占比能部分抵消税负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降低税负水平与优化税制结构的政策组合效应，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占比，建立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制结构体系，假设2得证。

**4.2.5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避免变量测度误差的干扰，特更换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测度方式，选用专利申请数加1与研发支出加1的自然对数的比值（Lneff）来表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回归结果如表4.6所示，列（1）中税负水平的系数为-0.166，且在5%水平上显著；列（2）中税负水平和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330和0.352，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改变时间窗口**

为排除疫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缩短时间窗口，去除2020—2022年区间的所有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由表4.6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可知，改变样本区间后，列（3）中税负水平的系数为-0.247，且在5%水平上显著；列（4）中税负水平和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710和1.033，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排除政策干扰**

考虑到一些政策的实施可能也会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产生影响，为此梳理了样本区间内政府所实施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激励作用。为排除此项政策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虚拟变量（Treat），若样本企业属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行业，且所属时间区间位于2014年之后，则Treat取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4.6列（5）和列（6）所示。可见列（5）中税负水平的系数为-0.306，且在1%水平上显著；列（6）中税负水平和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0.702和0.824，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未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

**（4）工具变量法**

鉴于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可能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进而引发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取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的滞后一期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由结果可知，表4.6列（7）中税负水平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24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4.6列（8）中税负水平和交乘项滞后一期的系数分别为-0.828和1.268，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4.6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改变时间窗口 | | 排除政策干扰 | | 工具变量法 | |
| 1. Lneff | 1. Lneff | 1. Te | 1. Te | 1. Te | 1. Te | 1. Te | 1. Te |
| Tax\_1 | -0.166\*\* | -0.330\*\*\* | -0.247\*\* | -0.710\*\* | -0.306\*\*\* | -0.702\*\*\* |  |  |
| (-2.73) | (-2.64) | (-2.05) | (-2.51) | (-3.00) | (-3.48) |  |  |
| Tax\_2 |  | 0.026 |  | -0.120 |  | -0.011 |  |  |
|  | (1.71) |  | (-1.58) |  | (-0.28) |  |  |
| Tax\_1\*Tax\_2 |  | 0.352\* |  | 1.033\* |  | 0.824\*\* |  |  |
|  | (1.66) |  | (1.82) |  | (2.47) |  |  |
| Treat |  |  |  |  | -0.270\* | -0.031\* |  |  |
|  |  |  |  | (-1.81) | (-1.68) |  |  |
| L.Tax\_1 |  |  |  |  |  |  | -0.249\*\*\* | -0.828\*\*\* |
|  |  |  |  |  |  | (-2.78) | (-4.44) |
| L.Tax\_2 |  |  |  |  |  |  |  | -0.056 |
|  |  |  |  |  |  |  | (-1.05) |
| L.Tax\_1\*L.Tax\_2 |  |  |  |  |  |  |  | 1.268\*\*\* |
|  |  |  |  |  |  |  | (3.99) |
| Treat |  |  |  |  | -0.270\* | -0.031\* |  |  |
|  |  |  |  | (-1.81) | (-1.68) |  |  |
| Asset | 0.032\*\*\* | 0.032\*\*\* | 0.068\*\*\* | 0.067\*\*\* | 0.076\*\*\* | 0.074\*\*\* | 0.078\*\*\* | 0.077\*\*\* |
| (7.07) | (7.07) | (8.08) | (7.92) | (10.60) | (18.10) | (11.10) | (10.91) |
| Lev | 0.007 | 0.008 | 0.032 | 0.032 | 0.012 | 0.076\*\*\* | -0.021 | -0.021 |
| (0.41) | (0.51) | (1.14) | (0.51) | (0.49) | (10.47) | (-0.80) | (-0.82) |
| Top1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 (0.83) | (0.87) | (0.26) | (0.20) | (-0.04) | (-0.00) | (-0.82) | (-0.82) |
| Mag | 0.062\*\* | 0.067\*\* | 0.024 | 0.025 | 0.018 | 0.018 | -0.015 | -0.013 |
| (2.14) | (2.38) | (0.34) | (0.38) | (0.29) | (0.29) | (-0.27) | (-0.24) |
| Soe | 0.014 | 0.015 | 0.014 | 0.014 | 0.017 | 0.017 | 0.023 | 0.023 |
| (0.72) | (0.76) | (0.31) | (0.31) | (0.40) | (0.41) | (0.63) | (0.64) |
| 企业、行业和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0.583\*\*\* | -0.589\*\*\* | -1.121\*\*\* | -1.053\*\*\* | -1.284\*\*\* | -1.276\*\*\* | -1.385\*\*\* | -1.345\*\*\* |
| (-6.02) | (-6.07) | (-6.19) | (-5.77) | (-8.33) | (-8.18) | (-7.53) | (-7.02) |
| 样本量 | 2,998 | 2,998 | 2,457 | 2,457 | 3,276 | 3,276 | 2,983 | 2,983 |
| R² | 0.355 | 0.315 | 0.442 | 0.457 | 0.485 | 0.472 | 0.494 | 0.486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4.3 进一步分析**

**4.3.1 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往往受到资金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双重制约。一方面，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和周期长的特征，持续的资金投入是确保研发创新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由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着较高的失败风险，金融机构基于风险规避的考量，往往很难向其提供资金，内部融资成为企业获取研发创新资金的主要渠道。较高的税收负担无疑会大量挤占企业现金流，提高研发投入成本，迫使企业减少或中断研发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够提升企业管理者的信心和风险偏好，进而激发企业创新意愿，提高企业创新水平（Brown et al.，2012）[93]。数字经济企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水平更高、不确定性更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税负水平过高往往会极大压缩数字经济企业的利润水平，降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不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Rego et al.，2012）[94]。基于此，本课题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水平两个维度进一步探究税制结构在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的原因，以发掘优化税制结构和降低企业税负的协同效应提升机制。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衡量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其绝对值越大说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风险承担水平（Risk）则采用企业盈利波动率来衡量，具体为企业净利润t-2到t年三年的波动率。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4.7所示，可见列（1）和列（2）中税负水平的系数分别为0.617和0.457，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1.191和-1.146，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税收负担会加剧数字经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收负担引致的融资约束。列（3）和列（4）中，税负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0和-0.197，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0.744和0.602，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税收负担会降低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能够削弱税收负担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综上可知，税制结构产生调节效应的原因是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能够缓解税收负担引致的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税收负担导致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表4.7 机制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融资约束 | | 风险承担水平 | |
| (1) | (2) | (3) | (4) |
| Tax\_1 | 0.617\*\* | 0.457\* | -0.240\*\* | -0.197\* |
| (2.35) | (1.79) | (-2.29) | (-1.93) |
| Tax\_1\*Tax\_2 | -1.191\*\* | -1.146\*\* | 0.744\*\*\* | 0.602\*\*\* |
| (-2.42) | (-2.34) | (3.37) | (3.03) |
| 控制变量 | 不控制 | 控制 | 不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3.506\*\*\* | -2.930\*\*\* | 0.029\*\*\* | 0.241\*\*\* |
| (-128.18) | (-13.61) | (2.75) | (3.40) |
| 样本量 | 3,276 | 3,276 | 3,231 | 3,231 |
| R² | 0.296 | 0.310 | 0.012 | 0.050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4.3.2 异质性分析**

**（1）产权性质**

依托于政府背书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备受青睐，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所面临的融资限制较为宽松、风险承担能力更强。此外，国有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不以营利作为单一目标，因此，本课题认为相对于国有数字经济企业，税制结构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为检验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产权异质性，又进行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分样本回归。由表4.8回归结果可知，列（1）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906，且不显著，列（2）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791，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税制结构的正向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中。

**（2）企业成长性**

企业成长性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因素之一。通常来说，处于高速成长期的数字经济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通过研发创新提升市场份额和核心竞争力的意愿较强烈。优化税制结构、减轻税收负担有利于缓解研发投资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降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风险，增强研发创新的可持续性。基于以上分析，本课题认为税制结构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高速成长期的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借鉴王鸿等（2023）的做法[95]，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引入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成长性。若企业成长性大于其平均数则为高速成长期企业，反之则为低速成长期企业，回归结果如表4.8所示。可见表4.8列（3）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945，且在5%水平上显著；列（4）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380，且不显著，说明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高速成长期的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明显。

**表4.8 异质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 | | | | | |
| （1）国有企业 | （2）非国有企业 | （3）高速成长企业 | （4）低速成长企业 | （5）市场竞争较强 | （6）市场竞争较弱 |
| Tax\_1 | -0.448 | -0.713\*\*\* | -0.526\*\* | -0.316\*\* | -0.709\*\*\* | 0.051 |
| (-0.82) | (-3.43) | (-2.39) | (-1.40) | (-3.32) | (0.15) |
| Tax\_1\*Tax\_2 | 0.906 | 0.791\*\* | 0.945\*\* | 0.380 | 0.778\*\* | -0.719 |
| (1.25) | (2.42) | (2.15) | (0.82) | (2.34) | (-1.11)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0.740\*\*\* | -1.284\*\*\* | -1.070\*\*\* | -1.050\*\*\* | -1.295\*\* | -1.263\*\*\* |
| (-2.20) | (-7.46) | (-7.05) | (-5.08) | (-7.88) | (-3.89) |
| 样本量 | 507 | 2,769 | 1,479 | 1,129 | 2,556 | 715 |
| R² | 0.500 | 0.438 | 0.531 | 0.592 | 0.427 | 0.529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3）市场竞争**

进一步考虑在不同强度的市场竞争水平下，税制结构调节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随着市场竞争水平的提升，低成本、低风险的研发创新难以维持企业原有的优势地位。市场竞争水平越高，企业为了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维持其竞争优势地位或规避被竞争对手挤占的风险而进行探索式创新的动机越强烈。一般而言，探索式创新持续周期更长，风险水平更高，需要的现金流更多。因此，本课题认为市场竞争越强，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借鉴陈宇峰等（2021）的做法[96]，引入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率作为企业市场竞争水平的代理变量。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数字经济企业为开拓市场而支付的销售费用随之增多，因此该指标与市场竞争水平呈正相关。若市场竞争水平超过该指标平均数，则认为该数字经济企业市场竞争较强，反之则认为市场竞争较弱。表4.8列（5）和列（6）报告了基于市场竞争水平的异质性回归结果。表4.8列（5）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778，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4.8列（6）中交乘项的系数为-0.719，且不显著，由此表明税制结构的正向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市场竞争较强的数字经济企业中。

**4.3.3 门槛效应分析**

**（1）门槛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探究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本课题采用税制结构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以探究不同税制结构区间内，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由于门槛数量未知，本课题构建了单一门槛模型，模型构建如下：

**** 

**（2）门槛检验结果**

为确定门槛的具体类型，采用Bootstrap抽样法估计相关统计量及门槛值。检验结果如表4.9所示，可见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估计值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可认为税制结构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表4.9 门槛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 | F值 | p值 | 临界值 | | |
| 10% | 5% | 1% |
| 单一门槛检验 | 45.55 | 0.000 | 10.807 | 12.716 | 16.146 |
| 双重门槛检验 | 30.18 | 0.000 | 9.512 | 11.663 | 16.270 |
| 三重门槛检验 | 12.00 | 0.613 | 40.308 | 46.140 | 58.241 |

注：P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Bootstrap抽样法重复抽样300次的结果。

**（3）门槛值估计**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课题采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表4.10报告了双重门槛的估计值及其对应的95％水平的置信区间。由结果可知，税制结构的第一门槛估计值为0.448，95％的置信区间为［0.440，0.448］；第二门槛估计值为0.675，95%的置信区间为［0.639，0.699］。根据上述结果，将数字经济企业划分为Tax\_2≤0.448、0.448<Tax\_2≤0.675和Tax\_2>0.675三组。

**表4.10 门槛值估计**

|  |  |  |
| --- | --- | --- |
| 门槛值和置信区间 | 估计值 | 95%置信区间 |
| 门槛值б1 | 0.448 | [0.440,0.448] |
| 门槛值б2 | 0.675 | [0.639,0.699] |

**（4）门槛回归结果**

由表4.11回归结果可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税制结构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当Tax\_2≤0.448，税负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366，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0.448<Tax\_2≤0.675时，税负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280，在5%水平下显著；当Tax\_2>0.675时，税负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以上结果说明，随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的提升，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逐渐下降，最终不再显著。究其原因，优化税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税负压力，从而削弱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因此，为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国应坚持降低税负与优化税制结构政策并举，更好地发挥减税降费与税制结构优化的协同效应，以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

**表4.11 门槛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门槛值 | Tax\_1\*I | 控制变量 | 常数项 | R² |
| Tax\_2≤0.448 | -0.366\*\*\* | 控制 | -0.835\*\*\* | 0.467 |
| (-2.68) | (-3.36) |
| 0.448<Tax\_2≤0.675 | -0.280\*\* | 控制 | -1.096\*\*\* | 0.489 |
| (-2.46) | (-6.16) |
| Tax\_2>0.675 | 0.013 | 控制 | -1.824\*\*\* | 0.435 |
| (0.03) | (-3.69)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第五章 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评估：税收治理方式视角**

税收治理方式变革是推动税收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是税收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税收管理向税收治理转变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方式的研究中，本章以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为背景，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税收征管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建立中介效应模型，从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成本的角度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内在途径。最后，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和规模异质性。

**5.1 研究设计**

**5.1.1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构建了多期DID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Te表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GTP为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征管数字化；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合集；i、t、j和p分别代表企业、年份、省份和行业，σ、δ和分别代μ表企业、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5.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章主要从税收治理方式的角度评估税收治理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具体以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为背景，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所选择的研究样本仍然为A股数字产业化企业。考虑到金税三期工程于2013年开始试点运行，直到2016年实现全面上线，故选择2011—2022年作为样本区间。本章对数据所做处理与第四章相同。最终得到263家企业，共3028个观测样本。文中的企业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税收征管数据来自国家税务总局。

**5.1.3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水平（Te）。与前文相同，从创新效率的角度测算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测算方式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其中，创新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分别为企业研发费用的自然对数和企业申请专利数的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税收征管数字化（GTP）。税收征管数字化指标为虚拟变量，根据金税三期工程在各省市的运行时间设定，因为金税三期工程在各个地区逐步、分批实施，故选择多时点的DID识别策略。具体的，当某省（市）在t年上线“金税三期”工程，则GTP在第t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为避免系统调试运行而带来的政策效果滞后影响，将下半年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地区时间节点视为下一年。

**（3）控制变量**

本章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与上一章相同，主要包括：负债水平（Lev）、公司规模（Asset）、股权集中度（Top10）、管理费用率（Mag）和企业产权性质（Soe）。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5.2.1 描述性统计**

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企业创新效率（Te）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376、0.198和0.830，标准差为0.159，表明数字经济企业之间的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的数字经济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差距大，导致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税收征管数字化（GTP）的均值为0.571，表明样本企业中受到“金税三期”工程影响的占比为57.1%。

**表5.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样本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Te | 3,028 | 0.376 | 0.159 | 0.198 | 0.830 |
| GTP | 3,028 | 0.571 | 0.495 | 0 | 1 |
| Asset | 3,028 | 21.919 | 1.166 | 19.337 | 25.665 |
| Lev | 3,028 | 0.339 | 0.178 | 0.040 | 0.787 |
| **续表5.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 | | |
| 变量 | 样本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Top10 | 3,028 | 52.140 | 15.738 | 18.680 | 92.330 |
| Mag | 3,028 | 0.130 | 0.096 | 0.014 | 0.615 |
| Soe | 3,028 | 0.153 | 0.360 | 0 | 1 |

**5.2.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2所示，由结果可知，税收征管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系数为0.362，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税收征管数字化变革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产权性质与数字企业创新呈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费用率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

**表5.2 相关性分析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 | Treat | Asset | Lev | Top10 | Mag | Soe |
| Te | 1 |  |  |  |  |  |  |
| Treat | 0.362\*\*\* | 1 |  |  |  |  |  |
| Asset | 0.674\*\*\* | 0.421\*\*\* | 1 |  |  |  |  |
| Lev | 0.399\*\*\* | 0.224\*\*\* | 0.490\*\*\* | 1 |  |  |  |
| Top10 | -0.098\*\*\* | -0.385\*\*\* | -0.157\*\*\* | -0.162\*\*\* | 1 |  |  |
| Mag | -0.249\*\*\* | -0.335\*\*\* | -0.347\*\*\* | -0.325\*\*\* | 0.054\*\*\* | 1 |  |
| Soe | 0.240\*\*\* | 0.035\* | 0.199\*\*\* | 0.143\*\*\* | -0.051\*\*\* | -0.096\*\*\* | 1 |

**5.2.3 多重共线性分析**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5.3所示，由结果可知，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变量** | **VIF** | **1/VIF** |
| GTP | 1.49 | 0.672 |
| Asset | 1.59 | 0.629 |
| Lev | 1.39 | 0.721 |
| **续表5.3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 | |
| 变量 | VIF | 1/VIF |
| Top10 | 1.20 | 0.833 |
| Mag | 1.26 | 0.796 |
| Soe | 1.05 | 0.952 |
| Mean VIF | 1.33 | |

**5.2.4 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前，本课题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由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豪斯曼统计量为64.06，且在1%水平上显著，故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4所示。列（1）中仅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征管数字化，回归过程中固定了企业和年份效应，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回归系数为0.014，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列（2）在上述回归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纳入了控制变量，可见回归系数为0.018，显著性水平仍为5%；列（3）在列（2）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列（2）基本一致。以上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以后，改变了税收征管模式，提升了纳税效率，保障了数字经济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应享尽享，为试点地区带来了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和监督优势，进而提高了试点地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就经济意义而言，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了约4.8%（0.018/0.376），从而假设H1得到验证。

**表5.4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 | (2) | (3) |
| Te | Te | Te |
| GTP | 0.014\*\*  (1.68) | 0.018\*\*  (2.23) | 0.018\*\*  (2.25) |
| 控制变量 | 未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3,028 | 3,028 | 3,028 |
| R² | 0.308 | 0.482 | 0.472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5.2.5 平行趋势检验**

上述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在文中具体体现为要满足受金税工程上线影响的实验组与未受金税三期工程影响的对照组之间存在的差异应发生在政策实施之后，而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之前控制组与实验组创新水平的变化趋势应该保持一致。为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定义了如下虚拟变量：Pre-3、Pre-2、Pre-1，它们代表的意义分别是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实施的前三年、前两年以及前一年。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表5.5所示，可见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三年、前两年和前一年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差距是由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所造成的，因此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表5.5**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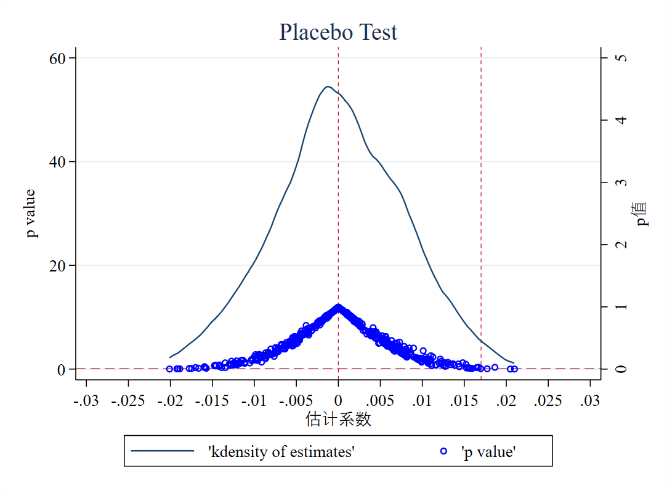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 Te | 1. Te | 1. Te | 1. Te |
| GTP | 0.018\*\*  (2.25) |  |  |  |
| Pre-1 |  | 0.013  (1.64) |  |  |
| Pre-2 |  |  | 0.012  (1.61) |  |
| Pre-3 |  |  |  | 0.006  (0.65)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3,028 | 3,028 | 3,028 | 3,028 |
| R² | 0.472 | 0.334 | 0.465 | 0.331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5.2.6 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的干扰，本课题又进行了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安排金税三期工程的上线时间进行安慰剂测试，理论上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上述实验中应该不具有显著性，即伪处理组的回归系数应该接近于0。反之，则说明文中的模型设定不合理。在此基础上，重复500次上述随机试验过程，实验结果如图5.1所示，其中两条垂线分别代表估计系数为零和实际估计系数。由结果可知，在上述随机实验中，估计系数的均值位于0值附近，大部分p值在0.1以上，并且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实际估计系数（0.018）也位于小概率事件范围内，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5.1 安慰剂检验**

**（2）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避免变量测算误差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进一步变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选取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数作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替代指标。具体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申请量加1的自然对数与研发支出加1的自然对数的比值。表4列（1）报告了上述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09，且显著性水平与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排除政策干扰**

文中所选取的样本区间正处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政策的实施可能也会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带来影响。通过梳理考察期所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企业创新活动。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的实际税负，增加企业的实际现金流；另一方面，也能够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水平。为排除上述税收政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又在模型中加入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虚拟变量（Treat），若观测值在2014年之后且所属企业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行业，则Treat取值为1，否则取为0。由表5.6列（2）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18，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结果并未受到“营改增”政策的影响。

**（4）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检验**

为排除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对同期财务指标的反向作用，本课题把控制变量中所有财务指标滞后一期再次进行回归。由表5.6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1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结果并未受到反向因果关系的干扰。

**（5）改变时间窗口**

考虑到2019年实施的国地税合并政策可能会对税收征管强度带来影响，本课题缩短样本时间窗口，选用2011—2018年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由表5.4列（4）回归结果可知，在充分考虑国地税政策影响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14，且在5%水平上显著，前文所述结论保持不变，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5.6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替换被解释变量 | （2）排除政策干扰 | （3）控制 变量滞后一期 | （4）改变时间窗口 |
| GTP | 0.009\*\*  (1.87) | 0.018\*\*  (2.25) | 0.015\*  (1.92) | 0.014\*\*  (1.73)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 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3,008 | 3,028 | 2,720 | 1,980 |
| R² | 0.347 | 0.472 | 0.453 | 0.374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5.3 进一步讨论**

**5.3.1 机制分析**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根据资金获取渠道的不同，企业融资可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在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对融资企业的经营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做出评估，从而引发信贷配给问题（Stigli et al.，1981）[97]，导致企业外部融资陷入困境。此外，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水平高和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困境。为规避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拒绝向其提供资金。税收征管数字化极大提高了数字经济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收集成本，在资本供需双方发挥了“桥梁效应”，从而缓解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融资困难。参考现有文献做法，选择SA的绝对值作为融资约束水平（Sa）的代理变量，其值越大说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为检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本课题又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Sa为融资约束水平，式（5.2）旨在验证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中介变量融资约束的影响，式（5.3）旨在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和融资约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7所示。由结果可知，列（1）中税收征管数字化系数为0.017，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列（2）中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12，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有效缓解了数字经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列（3）报告了加入中介变量融资约束后的回归结果，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15，与列（1）相比较小；而融资约束的系数为-0.158，且两者的系数均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由此说明，融资约束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起部分中介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发挥“治理效应”，税收征管数字化实现了涉税信息的交叉稽查，能够对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有效抑制其对公司利益的“挖空行为”，从而缓解企业内部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发挥“桥梁效应”，依托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金税三期工程建立了多方信息共享机制，增加了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降低了资金供给方的信息收集成本，有利于促进借贷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从而疏通企业外部融资渠道。

**表5.7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 | (2) | (3) |
| Te | Sa | Te |
| GTP | 0.017\*  (1.85) | -0.012\*  (-1.66) | 0.015\*  (1.66) |
| Sa |  |  | -0.158\*\*\*  (-2.67)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1,508 | 1,508 | 1,508 |
| R² | 0.471 | 0.275 | 0.555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引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在如何缓解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上，Haw et al.（2004）认为[98]，与法律传统和执法效率相比，税收征管在规范管理层收入、抑制代理行为等方面更为有效。同期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的地区，控制权私利水平往往较低（Dyck，2004）[99]，委托代理问题相对缓和。其核心原因在于，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所推动的组织重构，显著增加了公司管理层在隐匿应税收入及转移企业资产等方面的难度（Desai，2007）[100]，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

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是指股东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目标利益偏差所引致的委托人利益损失；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则指控股股东对非控股股东的剥削，其实质是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上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均会挤占企业可用现金流，不利于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税收征管数字化赋予政府更有力的稽查权，提高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为揭露控股股东和管理者的私利行为提供了新的视野。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政府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有效抑制控股股东和管理者对企业的掏空行为，实现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的良性互动（曾亚敏 等，2009）[101]。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本课题采用资本周转率即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第一类代理成本（AC1）的代理变量，资本周转率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负相关，资本周转率越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越低。第二类代理成本（AC2）则采用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比值越大说明第二类代理成本越高。为检验两类代理成本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本课题又进一步构建了以下两个模型。





其中，AC代表第一类或第二类代理成本，式（5.4）旨在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式（5.5）旨在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和两类代理成本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5.8 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 | (2) | (3) |
| Te | AC1 | Te |
| GTP | 0.017\*\*  (1.91) | 0.024\*  (1.66) | 0.014\*  (1.66) |
| AC1 |  |  | 0.097\*\*\*  (4.76)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 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2,462 | 2,462 | 2,462 |
| R² | 0.475 | 0.233 | 0.513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8。列（1）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无本质区别。列（2）是税收征管数字化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24，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征税对资本周转率具有正向影响，即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降低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列（3）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和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4和0.097，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可通过提升资本周转率即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间接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第一类代理成本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起部分中介效应。从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会增加企业管理费用，不利于企业留存收益的增加，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强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互动，为监督管理者行为提供了全新视野，有效抑制了其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9。列（1）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本质区别。列（2）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为-0.00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控股股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助于减少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列（3）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第二类代理成本的相关变量，由结果可知，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为0.015，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系数为-0.283，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间接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类代理成本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起部分中介效应。税收征管数字化所带来的监督优势，极大压缩了大股东的谋利空间，提高了数字经济企业现金流水平，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表5.9 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变量 | (1) | (2) | (3) |
| Te | AC2 | Te |
| GTP | 0.016\*\*  (1.99) | -0.004\*  (-1.66) | 0.015\*  (1.87) |
| AC2 |  |  | -0.283\*\*\*  (-3.00)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2,823 | 2,823 | 2,823 |
| R² | 0.504 | 0.129 | 0.510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5.3.2 异质性分析**

**（1）产权性质**

进一步考虑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以营利作为单一目标，因此，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较小，对税收征管变动的敏感度也较低。另一方面，依托于政府背书和得天独厚的类公共部门性质，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备受青睐，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而非国有企业往往难以得到足够的外部资金支持。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为严重（邓可斌 等，2014）[102]，可能导致其放弃良好的创新机会或中断正在进行的创新活动，最终无法实现创新投资效率的最优化（任曙明 等，2014）[103]。税收征管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信贷融资能力（王丽 等，2023）[104]，拓展融资渠道，基于以上分析，本课题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为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不同产权性质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样本回归。表5.10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国有和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的回归结果，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在列（1）中为0.012，且不显著；在列（2）中为0.01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国有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能够促进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究其原因，非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强，税收征管数字化所发挥的桥梁效应，提高了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加快了企业融资进程，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困境，因此，相对于国有数字经济企业而言，其对非国有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2）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来说，大规模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更具优势。首先，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往往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较强的收益创造能力，可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更多，内部融资能力更强。其次，有研究表明，小规模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信息透明度更弱（Rajan，1992）[104]，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收集成本，使其难以对小规模企业进行信用评估，小规模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受阻。最后，从代理成本的角度看，大规模企业的管理机制相对完善，股东可以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代理成本相对较低，留存资金更为充裕。因此，本课题认为企业规模越小，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明显，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就越显著。

基于企业资产总额的均值，本课题又进行了大规模和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的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10列（3）和列（4）所示，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列（3）中为0.010，且不显著；在列（4）中系数为0.016，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对大规模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不同规模企业在管理机制、风险承担以及融资约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通常处于劣势地位。税收征管数字化改善了企业委托代理关系、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而其创新促进作用在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田发和李倩，2024）。

**表5.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企业性质 | | 企业规模 | |
| （1）国有企业 | （2）非国有企业 | （3）大规模企业 | （4）小规模企业 |
| GTP | 0.012  (0.79) | 0.015\*  (1.69) | 0.010  (0.48) | 0.016\*  (1.83)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453 | 2,565 | 632 | 2,376 |
| R² | 0.577 | 0.435 | 0.350 | 0.214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课题构建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与税收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梳理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并从税收治理制度和税收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维度的表现**

一方面，从税收治理制度层面看，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是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核心要素，对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重大影响。合理的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有利于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其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从税收治理方式层面看，科学高效的税收治理方式是确保税收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税收征管数字改革改善了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内部治理，在降低融资约束、缓解委托代理等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

**（2）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问题**

第一，税收治理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税收原则和税收管辖受到冲击；税制结构不合理；税制要素难以有效锁定。第二，税收治理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税务机关的技术手段有待提高；税务机关尚未建立与第三方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第三，税收优惠方面，主要表现为企业认定条件严格，税收优惠门槛高；间接税税收优惠较少；缺乏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3）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制度效果**

第一，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税制结构在税负水平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提高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通过缓解税负水平引致的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税负水平带来的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间接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第三，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成长性及市场竞争水平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具有差异性，表现为税制结构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高速成长和市场竞争较强的数字经济企业中更为显著。第四，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的提高，税负水平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逐渐减小，最终不再显著。

**（4）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税收治理方式效果**

第一，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两类代理成本间接作用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成本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中起部分中介效应。第三，相对于国有和大规模数字经济企业，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和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6.2 政策建议**

税收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的系统工程，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需要增强多元主体的联动机制，从税收治理制度、税收治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入手。本课题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6.2.1** **完善税收治理制度，激发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活力**

税收治理制度是税收治理的基础保障，在确保税收公平及效率，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应持续关注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等税收治理制度建设，根据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水平和创新情况，合理确定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并兼顾两者间的协同效应。为此，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降低数字经济企业税负，完善税收优惠体系。税收负担过重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大痛点，有学者指出，我国企业税负接近“死亡税率”，严重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减税降费是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然之举。此外，我国当前适用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行业，尚缺乏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特定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税收优惠体系，进一步降低数字经济企业税收负担。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政府应加快设立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并降低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认定门槛，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减税降费红利的“获得感”。二是对数字经济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税收优惠，并适当提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税前扣除比例，从而建立起涵盖引进、培养等多个环节的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以降低企业人力成本。三是政府应加大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免费税收优惠政策咨询服务，帮助数字经济企业更好地解读和了解税收优惠政策，确保税收优惠政策的应享尽享

第二，优化税制结构，增强税收政策协同效应。当前，我国税制结构呈现间接税比重过高的特点，其引致的税收收入结构失衡严重抑制了企业创新发展。政府要适度调整税制结构，注重税收政策间的协同机制。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政府可通过提高直接税占比来逼近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最优比例，以减轻税收负担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增值税在间接税中的主体地位，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从增值税入手。同时，由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直接税上，政府应加快出台间接税税收优惠政策，并逐步扩大间接税税收优惠覆盖面。二是政府可考虑进一步简并增值税税率，税率档次过多不仅增加了征税过程的复杂性而且会影响企业间的税负公平。目前我国主要实行13%、9%、6%三档税率，政府可推进“三档并两档”改革，进一步简并增值税税率。三是政府要注重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的协同联动，并密切关注政策协同的激励效果，不断调整和完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税收政策，确保税收政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相适应。

**6.2.2 优化税收治理方式，改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环境**

税收征管是税收治理的核心环节，也是确保税收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税务机关致力优化税收征管体系，提升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在简化税收征管流程，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税收征管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为此，税务机关可采取以下措施：

1. 优化税收征管流程，提高“以数治税”水平。一是税务机关应进一步简化税收征管流程，促进税收征管体系“扁平化”发展，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二是税务机关应提升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征税体系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金税四期建设中，通过扩大税收监管范围，实现对企业活动更全面的监督，严格监督并遏制高管和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是税务机关应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推动纳税服务向精细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不断推出创新服务举措并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加大对征税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征税人员业务水平，为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从而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2. 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目前，我国税务机关尚未构建与第三方平台的数据交互机制，缺乏获取纳税人涉税信息的有效渠道，为部分市场主体逃避纳税义务提供了可操作空间。因此，税务机关应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机制。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应明确税务机关和第三方平台的权利义务，确定共享数据内容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纳税人的基本信息、交易数据和支付数据等。二是税务机关应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提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以便更好地利用第三方平台的相关信息进行税收征管，同时也要鼓励第三方平台加快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信息获取质量和传递效率。三是税务机关应加强与第三方平台的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问题解决机制，同时税务机关要加大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督力度，确保共享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6.2.3** **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政策精准度**

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是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确保税收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政府和税务机关应高度重视税收治理配套措施的建设和完善工作，加强各部门和各主体的协同配合，提升税收治理的创新激励效果。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完善税收治理配套措施，强化数字经济企业创新间接作用机制。一是加大对数字经济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数字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政府应改善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环境，并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担保和增信服务，同时推动“银企合作”，引导银行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降低数字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满足数字经济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同时，政府要加大对金融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对金融政策的认知水平。三是健全数字经济企业风险分担机制，增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失败的“容错率”。为此应当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创新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帮助企业识别潜在投资风险，以便企业采取精准科学的防范措施，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同时要完善数字经济企业创新风险补偿机制，通过设立创新风险补偿基金或专项财政补贴等政策降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失败损失，提高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积极性。

第二，实施差异化税收治理政策，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激励的精准度。公平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是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政府在实施数字经济企业税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企业成长性以及企业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税收政策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企业的多样性特征。一方面，非国有企业、高速成长企业和市场竞争较强的数字经济企业对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反应更加敏感，政府应给予他们更大的减税降费力度，以提高其研发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在税收征管安排上，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对于税收征管技术进步的反应更加敏感，在数字化征税的背景下，政府更应该关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变化，通过完善数字化税收征管来为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创造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燕明. 民国时期遗产税征管制度考察[J]. 税务研究, 2015(2): 118-124.
2. 向景, 魏升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影响分析——来自广东省的问卷调查[J]. 税务研究, 2017(5): 72-77.
3. 阚道远, 王明世. 推进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N]. 经济日报, 2020-01-21(11).
4. 杨世鉴.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税制改革: 从税收管理到税收治理[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 45(4): 77-82.
5. Kim, A. Barua, A. B. Whinston. Virtual field experiments for a digital economy: a new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exploring an information economy[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2, 32(3): 215-231.
6. Bukht, 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R]. Development Informatics Working Paper, 2017.
7. 关会娟, 许宪春, 张美慧, 等.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J]. 统计研究, 2020, 37(12): 3-16.
8. 张雪玲, 焦月霞.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4): 32-40+157.
9. 陈邱惠, 杭静, 徐现祥. 经济增长目标、税收特惠政策与资源配置[J]. 南开经济研究, 2023(4): 62-80.
10. Davis, J. C., Henderson J. V. The agglomeration of headquarter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8, 38(5): 445-460.
11. 杨广莉, 孙慧卿.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兼析新冠疫情下的减税降费政策效应[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8): 84-87.
12. 于井远. 税制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 经济评论, 2022(2): 36-50.
13. 张胜民. 我国税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兼论税收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J]. 财贸经济, 2013(9): 16-27.
14. 李齐云, 周雪, 孙靖然, 等. 税权分权度、经济增长及成因探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17(6): 8-16.
15. 鹿刚, 李家佳. 我国税收与税源背离情况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 时代金融, 2023(9): 17-20.
16. Agrawal, David R. The Internet as a Tax Have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1(4): 1-35.
17. Bloch, F., Demange G. Profit-splitting rules and the taxation of multinational digital platforms[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21(2): 1-3.
18. 杨庆. 数字经济对税收治理转型的影响与对策——基于政治经济学和治理理论分析视角[J]. 税务研究, 2020(10): 56-62.
19. 杨世鉴.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税制改革: 从税收管理到税收治理[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 45(4): 77-82.
20. 徐绮爽, 王宝顺. 数字经济与区域间横向税收分配失衡——基于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的考察与实证检验[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03): 82-96.
21. 黄丽君. 数字经济下税收治理嵌入纳税人自然系统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4, 45(1): 65-73.
22. 金鹏. 平台数据共享对数字经济税收遵从的影响机理[J]. 会计之友, 2024(18): 50-57.
23. 杜剑, 滕丹妮. 数据要素价值化及涉税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 2024(11): 61-67.
24. 孙正, 朱学易, 张艺川, 等. 我国未来产业的税收治理: 理论溯源、逻辑框架与战略取向[J]. 中国软科学, 2024(10): 32-42.
25. 胡若凡, 尹威. 税收治理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经济师, 2021(11): 106-108.
26. 王雍君. 数字经济对税制与税收划分的影响: 一个分析框架——兼论税收改革的核心命题[J]. 税务研究, 2020(11): 67-75.
27. 袁从帅, 赵妤婕. 数字经济税收转移: 机制、现状及国际经验借鉴[J]. 国际税收, 2021(9): 65-72.
28. 曹静韬, 张思聪. 数字经济对我国地区间税收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J]. 税务研究, 2022(6): 13-21.
29. 田彬彬, 张欢. 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制度的适应性改革研究[J]. 税务研究, 2024, (10): 31-36.
30. 王丽娜.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J]. 国际税收, 2021(12): 65-70.
31. 秦思楠. 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 南方金融, 2022(3): 41-50.
32. 王雍君, 王冉冉. 数字经济税收治理: 辖区规则、财政自立与均等化视角[J]. 税务研究, 2022(1): 49-58.
33. 马洪范. 财政治理实践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J]. 中国财政, 2021(14): 61-64.
34. 王宏伟. 数字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立场、原则与进路[J]. 税收经济研究, 2023, 28(5): 26-34.
35. 刘奇超. 经济数字化税收政策体系建构的新观察与新思路: 一个总体分析框架[J]. 国际税收, 2019(3): 25-33.
36. 李慧敏. 元宇宙经济对国际税收管辖权的挑战及应对[J]. 税收经济研究, 2022, 27(3): 12-19.
37. 樊勇, 邵琪. 数字经济、税收管辖与增值税改革[J]. 国际税收, 2021(3): 11-17.
38. 崔琳, 周方伟, 李军林. 地方经济增长的目标驱动机制与实证检验[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4): 136-144.
39. 李建军, 赵晓彧, 李鑫. 数字经济与横向税收分配: 商品价值增值效应和去分支化效应[J]. 财政研究, 2023(8): 101-113.
40. 李鑫钊.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税收征管的建议[J]. 税务研究, 2023(1): 129-132.
41. Kleven, H. J. How Can Scandinavians Tax So Much?[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8(4): 77-98.
42. 秦思楠. 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 南方金融, 2022(3): 41-50.
43. 田发, 康家烁, 周琛影. 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制度的冲击及应对策略——以长三角区域为例[J]. 地方财政研究, 2023(9): 59-69.
44. 袁娇, 王敏. 税收制度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 适配逻辑、适配向度及改革前瞻[J]. 税务研究, 2024(10): 17-23.
45. 蒋轶彪, 张习列, 刘晓, 等. 优化平台经济税收治理的思考——基于青海省海东市数字经济业态的调研[J]. 税务研究, 2024(11): 75-80.
46. 邓力平, 何巧, 王智烜. 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对创新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0, 36(6): 101-111.
47. 肖鹏, 代龙涛.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创新激励: 效应分析与政策启示[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3, 39(5): 21-35.
48. Guceri, I. Will the real R&D employees please stand up? Effects of tax breaks on firm-level out-comes[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8, 25(1): 1-63.
49. 刘诗源, 林志帆, 冷志鹏. 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 经济研究, 2020, 55(6): 105-121.
50. 胡华夏, 洪荭, 李真真, 等. 成本粘性刺激了公司研发创新投入吗?[J]. 科学研究, 2017, 35(4): 633-640.
51. 林志帆, 刘诗源. 税收负担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17(2): 98-112.
52. 李苏敏, 李小胜. 减税能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吗?——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证据[J]. 财贸研究, 2020, 31(4): 75-87.
53. 孙红燕, 刘归壹, 吴华清. 地方政府专项债促进了企业创新吗?[J]. 财政科学, 2024(6): 115-131.
54. 孔军, 原靖换.“减税降费”下上市企业税负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S1): 268-276.
55. 杨国超, 刘静, 廉鹏, 等. 减税激励、研发操纵与研发绩效[J]. 经济研究, 2017, 52(8): 110-124.
56. 周宇, 惠宁, 高卓远. 减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的中国工业企业的非线性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7): 65-78.
57. 郝秀琴, 杨伯坚. 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J]. 经济经纬, 2023, 40(5): 150-160.
58. 汪卢俊, 韩瑜, 马金红. 税制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J]. 中国科技论坛, 2019(5): 1-9.
59. 林志帆, 刘诗源. 减轻企业研发创新税收负担的对策建议[J]. 经济研究参考, 2017(18): 16-17.
60. 吴强, 刘志安. 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基于上市公司的中介效应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 2021(8): 68-79.
61. 肖叶. 税制结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286个地级市专利授权数据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 2019(8): 26-31.
62. 何培育, 蒋敏. 税制结构对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的影响[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6): 135-142.
63. Karthik, B., Jennifer I. B., Wayne R. G. Tax aggressiveness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9, 94(1): 45-69.
64. 田发, 邹思远. 税收信息化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吗?[J]. 财会月刊, 2024, 45(03): 114-120.
65. 兰竹虹, 曾晓, 辛莹莹. 产业竞争视角下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竞争效应”和“资源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21(2): 181-192.
66. 唐玮, 赵星竹, 周畅. 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 抑制或激励——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22, 41(6): 1116-1131.
67. 何凌云, 陶东杰. 税收征管、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J]. 科研管理, 2020, 41(9): 42-50.
68. 白世杰. 数字化转型、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能力[J]. 财会通讯, 2023(22): 32-37.
69. 谢乔昕.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治理效应研究[J]. 地方财政研究, 2024(4): 61-74.
70. 谢获宝, 吴壮倩, 惠丽丽. 税收征管、营改增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J]. 财经论丛, 2020(7): 3-42.
71. 孙雪娇, 翟淑萍, 于苏. 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3): 81-99.
72. 李林木, 于海峰, 汪冲, 等. 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20, 55(6): 89-104.
73. 王钰琪. 企业避税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10): 137-144.
74. 李文贵, 商影. 企业避税决策与创新活动:来自资源观的证据[J]. 税收经济研究, 2019, 24(6): 32-45.
75. 张欣, 董竹. 避税与企业创新: 基于价值观和代理观视角[J]. 管理科学, 2022, 35(2): 32-46.
76. Balakrishnan, K., Blouin J. L., Guay W. R.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Reduce Corporate Transparenc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1, 1-67.
77. Biddle, G. C., G. Hilary, R. S. Verdi.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2-3):112-131.
78. 纪亚方, 梁日新, 池亚楠.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 当代财经, 2023(2): 43-54.
79. 王丽, 吴乐, 王云霞. 税收征管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J]. 财会月刊, 2023, 44(11): 112-120.
80. 刘忠, 李殷. 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2年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J]. 财贸经济, 2019, 40(7): 5-19.
81. 童锦治, 黄克珑, 林迪珊. 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企业经营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财经, 2016(3): 24-32.
82. 蔡昌, 林高怡, 王卉乔.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J]. 会计研究, 2021(5): 107-120.
83. Hanlon, M., Hoopes J. L., Shroff N. The Effect of Tax Authority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2014, 36(2): 137-170.
84. 樊勇, 李昊楠. 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J]. 财贸经济, 2020(5): 51-66.
85. 刘胜强, 林志军, 孙芳城, 等.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5(11): 62-68.
86. Zhu ,C. Big date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5): 2021-2061.
87. 曾亚敏, 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J]. 管理世界, 2009(3): 143-151.
88. 邝嫦娥, 刘江月, 李文意.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J]. 当代财经, 2024(5): 114-127.
89. 胡元木. 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高R&D产出效率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 2012, 15(2):136-142.
90. 李青原, 吴立扬, 蔡贵龙.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J]. 管理科学, 2022, 35(4): 99-111.
91. 余红艳, 沈坤荣. 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分税制改革20年实证分析 [J]. 财贸研究, 2016, 27(2): 104-111.
92. 魏志华, 王孝华, 蔡伟毅.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3): 152-170.
93. Brown, L., P. S. Osborne. Risk and innovation[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s, 2013(2): 186-208.
94. Rego, S. O., R. Wilson.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50): 775-810.
95. 王鸿, 余欣旭. 企业成长性、风险投资与审计收费[J]. 会计之友, 2023(2): 28-36.
96. 陈宇峰, 马延柏. 融资渠道、产品市场竞争与成本粘性——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42(7): 126-144.
97. Stigliz, A., Weiss J.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98. Haw, I. M., Hu B., Wu H. W. Ultimate ownership, income management, and legal and extra-legal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 42(2): 423-462.
99. Dyck, A., Zingales L.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2): 537-600.
100. Desai, M. A., Dharmapala D. Tax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economic approach[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7(3): 13-30.
101. 曾亚敏, 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J]. 管理世界, 2009(3): 143-151.
102. 邓可斌, 曾海舰. 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 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J]. 经济研究, 2014, 49(2): 47-60.
103. 任曙明, 吕镯.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11): 10-23.
104. 王丽, 吴乐, 王云霞. 税收征管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J]. 财会月刊, 2023, 44(11): 112-120.
105. Rajan, R. G.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choice between informed and arm's-length debt[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2, 47(4): 1367-1400.
106. 田发, 李倩.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J]. 财会研究, 2024, (7): 13-21.

**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表论文：**

（1）\*\*、\*\*\*、\*\*\*：《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制度的冲击及应对策略——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地方财政研究》（CSSCI）2023年9期，p59-69。

（2）\*\*、\*\*\*：《税收信息化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吗》，《财会月刊》（北大核心）2024年2期，p114-120。

（3）\*\*、\*\*：《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财会研究》（SCD）2022年7期，p13-21。

（4）\*\*、\*\*：《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统计与决策》（CSSCI），2026年8期，字数1.8万。

**专报：**

\*\*、\*\*：《上海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治理策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2023年9月。